

亦詩亦史： 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

林立**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摘要

日軍佔領新加坡之初，進行全城大檢證，屠殺了至少二萬五千名新加坡華僑。嗣後又推出連串奴化、高壓政策，新加坡人民惶恐終日，加以物資匱乏、糧食短缺，生活極為艱苦。謝松山所著的舊體詩集《血海》，以紀事手法，附以詳盡的注文，紀述了日軍在檢證大屠殺中所犯的滔天罪行，以及日佔時期的種種社會怪象和民不聊生的情況。此書在四、五十年代曾先後在三種不同的出版媒體上發表，標題亦有大幅改動。筆者試圖探索這些標題變換所蘊含的意旨，並透過對《血海》的解讀和有關的史籍、報章材料的對照，從「詩史」研究、創傷回憶的角度，審視該書所涉及的詩與史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如何勾起當時新加坡華人慘痛的集體記憶。

關鍵詞：新加坡日佔時期，檢證大屠殺，創傷記憶，詩史傳統，《血海》，謝松山

* 本文曾於 2015 年 6 月 4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之「風雅傳承：民初以來舊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hsl1@nus.edu.sg

一、引言

1942年2月15日，日軍從馬來亞南下攻佔新加坡，時值壬午年元旦。後三日，日軍將新加坡易名為「昭南島」（Syonan-to，昭南意為「南方之光」¹）。新加坡由此進入三年半的淪陷期，直至1945年9月12日日軍正式向英軍投降為止。為鎮壓抗日活動，日軍在1942年2月21日至3月3日，在大坡、小坡、芽籠、後港、裕廊等區實行大檢證，被檢走的民眾多在海邊或鄉郊遭集體屠殺，據保守估計，遇難人數達二萬五千，幾乎都是華僑。另有不少人被押往其他地方當苦工。²淪陷期間，在日軍殘酷、高壓的統治下，新加坡人民惶恐終日，加以物資匱乏、糧食短缺，生活極為艱苦。這一段慘痛的經歷，在不少史籍、回憶錄中都有所記載，亦造就了一系列包括小說、散文等申訴日軍暴行的創傷文學。³筆者則發現了三套幾近被遺忘、有關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分別是謝松山（1891-1965）的《血海》、李西浪（1898-1972）的《劫灰集》和鄭光漢（1909-1971）編的《蘭花集》。⁴《血海》以紀事詩的形式，附以詳盡的注文，從個人及集體回憶的角度，追述了日佔時期暗無天日的境況，和審判日本戰犯屠城大檢證的過程。《劫灰集》收錄了李西浪寫於日佔時期的詩作。較之《血海》，該集敘事的成分減少，而側重於抒情。《蘭花集》則是亂世中的文人唱和，它以鄭思肖（1241-1318）等南宋遺民為榜樣，

¹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88.

² 據日軍隨軍記者高瀨稱，日軍原定屠殺五萬人，實際屠殺的數字，約為五萬人的半數。而1946年9月11日的《星洲日報》、《總匯報》社論則提到，根據戰時《彼南日報》（檳城）載稱，新加坡被檢證的「不良分子」為七萬餘人。日本的歷史學者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戰爭》一書，亦引1942年的《朝日東亞年鑑》的記載，認為新加坡共有七萬華僑被檢證。引自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2003），頁533-535。另參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教育出版，1994），頁213-215；Ralph Modder, *The Singapore Chinese Massacre: 18 February to 4 March 1942*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4), pp. 3, 58; "Plan to Kill 50,000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Strait Times* (Singapore), 19 March 1947, p. 5.

³ 例如李過的小說《昭南島的故事》、李金龍的散文集《日治時期的童年生活》。另參考 Yeo Song Nian (楊松年) and Ng Siew Ai (黃秀愛),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s Reflected in Singapore-Malaya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5-49)," in P. Lim Pui Huen and Diana Wong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106-119.

⁴ 謝松山，《血海》（新加坡：南洋報社，1950，10月第三版）（以下所引皆根據此一版本，除非另外注明）；李西浪，《劫灰集》（香港：永發印務，1946）；鄭光漢編，《蘭花集》（新加坡：鄭光漢，1966）。

透過詠蘭，寄寓作者的民族氣節和對光復的冀望，以及抑塞無聊、借酒澆愁的情態。因三部詩集創作背景不同，本文僅以《血海》為研究對象，其餘兩種另見拙文。⁵

《血海》不僅是一部戰爭回憶錄，謝松山顯然還有繼承中國「史詩」或敘事詩傳統的意圖。儘管飄洋過海到英殖民地生活的華人，早在日軍侵佔新加坡之前就已活在外族統治的陰影下，但讀者仍可透過這部詩集，將中華民族遭受外族欺凌的苦難史與新加坡的淪陷作出關聯。這部詩集又曾先後以三種不同的出版形式發表，標題亦有大幅改動，這種改動的背後，隱含了謝松山在回憶向度及作品的價值認知方面的轉變，顯示出他要向傳統「史詩」的道德高度靠攏。筆者在本文首先介紹戰前新加坡舊體詩與華文報業的關係，蓋因《血海》的出版以至新加坡舊體詩的發展，都離不開報界的推動。次則從創傷書寫與「史詩」傳統的角度，探索《血海》一書的傳世意義。第三部分展述《血海》的成書過程，以見出謝松山在價值判斷方面的蛻變，以及詩集的出版如何勾起戰後新加坡文化界慘痛的集體記憶。第四部分乃透過對作品的解讀和有關的史籍、報章材料的對照，闡釋詩人紀事與感事並重的創作傾向，作為聽者的他如何處理回憶者的陳詞，以及日佔時期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如何在詩中展現出來。

二、舊體詩、華文報及有關日佔的文學

早在十九世紀末，華文舊體詩（今或稱傳統漢詩）即隨清廷使節與流寓文人的南來播遷，在新加坡扎根繁衍。使節的提倡、文學社團的唱和以及報章的刊載，是舊體詩在新加坡本土流播推廣的主要動力和途徑。⁶ 從出版文化、文獻學及文學場

⁵ 林立，〈劫灰與蘭花：新加坡日據時期的兩部舊體詩集〉，《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3（香港：2016），頁 237-265。

⁶ 清廷駐新加坡第一任正式領事左秉隆（1850-1924）及其繼任者黃遵憲（1848-1905），在提倡華文教育與文化活動方面厥功至偉。參閱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32（臺北：2010），頁 359-397；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收入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前頁 1-9。至於流亡政客、文人如康有為（1858-1927）、丘逢甲（1864-1912）等，亦在南洋的華文詩史上留下足跡。見高嘉謙，〈帝國、詩與孔教的流亡：論丘逢甲與康有為的南洋詩〉，收入吳盛青、高嘉謙主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頁 183-215；黃錦樹，〈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海洋文化學刊》，4（基隆：2008），頁 1-24。以邱菽園為首的文學社團，則承繼了大中華的文人雅集傳統，凝聚了本地文人的向心力。見姚夢桐，〈時代的印記：邱菽園《檀榭詩集》的出版及其意義〉，《華人文化研究》，1（臺北：2013），頁 135-147。

域的角度來看，報章的作用尤值得注意。清朝正式派駐新加坡的第一任領事官左秉隆，曾創立專門撰寫對聯的會吟社，作品便都刊登在新加坡最早的華文報紙《叻報》。⁷ 據李慶年統計，戰前在新、馬華文報章上發表的舊體詩數目，即約有五萬首，數目相當龐大，當中更以新加坡一地為主。⁸ 淪陷前的報章，還出現了大量鼓吹抗戰的舊體詩，李氏甚至認為這些作品是歷來最有成就的。原因是在英國殖民政府的言論限制下，行文直率的馬華新文學進入低潮，用辭較為隱性的舊體詩卻能「含蓄地進行著宣傳抗日的工作」，說明「舊體詩有著本身有利的因素」，能「與新文學分擔抗日的神聖任務」。⁹ 淪陷時期撰寫的《劫灰集》和《蘭花集》，以及戰後出版的《血海》，都可視為戰前這類抗日舊體詩的延續。

無可否認，報界在推動舊體詩創作和凝聚寫作群體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且不少舊體詩人，本身就是報章的創辦人或編輯。他們因利乘便，往往在報章上發表自己及同仁的詩作，以建立、擴大他們的社會及文化影響力。張錦忠曾指出，使節及流寓文人透過編報，或組社，或唱和，在推廣舊體詩方面貢獻良多。「因為這群中國文人的離境，一個想像社群才有可能存在，有了這些舊文人在南洋活動，殖民地時的新馬離散華社很快產生了一個中國舊文學的傳統，雖然規模不大，但也發揮了一定的文化教育（與文學養成）功能，也讓一九二〇年代前後冒現的白話新文學有了革新的對象。」¹⁰ 他所列舉的其中一位詩人，人稱「南僑詩宗」的邱菽園（1874-1941），便曾在 1897 年創辦《天南新報》，任社長兼華文編輯；又在 1913 年承辦《振南日報》，任社長至 1920 年；1929 年他又出任《星洲日報》編輯，主編副刊「繁星」。¹¹ 1924 年至 1926 年，邱菽園與詩友結成檀社，當時他擔任《叻報》副刊「叻報俱樂部」及《南洋商報》副刊「商餘雜誌」的主編，經常在報章上為檀社提供作品發表的園地。¹² 此外，《劫灰集》的作者李西浪，曾在 1925 年與李鐵民（1898-1956）在新加坡合辦小報《消閒鐘》，並任經理；三十年代又於馬來

⁷ 葉鍾玲，〈左秉隆與會吟社〉，《中教學報》，27（新加坡：2001），頁 115-128。

⁸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27。

⁹ 同前引，頁 529。有關淪陷前新加坡的抗戰文學，參閱黃孟文、徐迺翔主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2），頁 39-105；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1986），頁 148-225；Wong Yoon Wah（王潤華），*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2), pp. 113-125.

¹⁰ 張錦忠，〈繼續離散，還是流動：跨國、跨語與馬華（華馬）文學〉，收入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主編，《馬華文學與現代性》（臺北：新銳文創，2012），頁 140。

¹¹ 柯木林主編，《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1995），頁 102-103。

¹² 姚夢桐，〈時代的印記：邱菽園《檀樹詩集》的出版及其意義〉，頁 137-138。

西亞怡保創辦《中華晨報》，自任社長和編輯，積極倡導抗日活動。¹³《蘭花集》的主導者鄭光漢，本身是美術家，1929 年在上海期間主編《上海漫畫》週刊，南渡新加坡後，任《南洋商報》畫刊主編。¹⁴

《血海》的作者謝松山，亦是報界名人，有筆名雪堂、伊凡。他祖籍福建省詔安縣，其父謝錫銘曾任清朝貴州知府。他曾在詔安縣當過教育科長，後赴香港經商。1934 年南來馬來亞，任檳城《新報》主筆，1937 年任《馬華日報》主筆兼代經理，1939 年兼《光華日報》編輯。淪陷時期，適在檳城執教，為逃避日軍迫害，遠遁新加坡。¹⁵ 1965 年 9 月 23 日在其明遠路五號寓所逝世。著有《赤雅軒憶語》、《赤雅軒吟草》及《赤雅軒吟草續集》等。¹⁶ 謝松山在戰後任職於《南洋商報》，負責採訪、編輯和社論的工作，直至 1956 年退休（見圖一）。該報創辦於 1923 年，是新加坡華文報的老字號。戰後在 1945 年 9 月 8 日即復刊，在當時各種條件均甚惡劣的情況下，能迅速復刊極為難得。同時該報又網羅了一批報界翹楚，由於內容豐富，頗受讀者歡迎，銷量在 1951 年達到每日五萬餘份。¹⁷ 其副刊「商餘」與「和平」，都刊登過不少舊體詩。謝松山所著的《血海》，部分即曾在「和平」上發表，而後再由南洋報社集結成書出版。為《血海》撰序或題詞的何桂琰、曾心影（1903-1988）、陳振夏（1911-1987）、連士升（1907-1973）、曾鐵忱（1903-1967）和姚紫（1924-1982）等，都曾在《南洋商報》供職，形成了一個以《南洋商報》為中心的寫作群體。從以上可見，二戰前後的報界中人，與新加坡的舊體詩界頗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報章則是舊體詩發表與傳播的重要媒介，與個人詩集比較，其流通面似乎更廣。

戰後的華文報，對淪陷時期的情況有大量報導，內容可分為淪陷過程、檢證大屠殺、日佔時期的社會與經濟狀況及日佔後的餘波等，報導年期甚至延展至八十年代。例如陳述淪陷過程的，有刊載於《南洋商報》的〈英陸軍部發表馬來亞戰敗原因檢討〉（1948 年 1 月 23 至 24 日），以及由大衛編譯的〈新加坡淪陷史略〉

¹³ 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香港：香港見證出版，1992），頁 464-465。

¹⁴ 〈鄭光漢傳略〉，泉州文史資料全文數據庫（<http://mnwhstq.cn/was40/detail?record=5011&&channelid=29719>），2016 年 3 月 16 日下載。

¹⁵ 謝松山，《血海》，曾心影〈序一〉，序頁 17-18。

¹⁶ 以上有關謝松山生平，部分參考自柯木林主編，《新華歷史人物列傳》，頁 195。其逝世消息，見〈老報人謝松山昨在寓宅逝世〉，《南洋商報》（新加坡），1965 年 9 月 24 日，第 6 張。

¹⁷ 《南洋商報》在戰後的出版情況，見崔貴強，《新加坡華文報刊與報人》（新加坡：海天文化，1993），頁 159-162。



战后初期的《南洋商報》编辑部领导层。从右至左：曾铁忱、薛残白、连士升、合众社记者、谢松山（前坐者）、王仲广、卓永庆、郁树鋸。

圖一：戰後初期的《南洋商報》編輯部領導層¹⁸

（1969年6月29日）；有關大檢證的，有刊載於《星洲日報》的〈武吉知馬大屠殺〉（1947年4月19日）；有關日佔時期的情況，有《南洋商報》的〈昭南時代組織之秘密浪機關〉（1947年7月12日），《新明日報》的〈昭南時代教育方針〉（1984年5月27日）；有關戰犯審訊的，有《南洋商報》的〈戰犯與助敵份子之定義〉（1945年10月30日），《南洋雜誌》刊載的〈新加坡大檢證案戰犯審訊〉（1947年4月1卷6期）。《南洋商報》還在1947年3月21日至4月7日連續報導戰犯法庭審訊的情況。

戰後亦出現了不少描述淪陷時期的小說，短篇如林參天的《餘哀》、丘天的《復仇》，長篇如苗秀的《火浪》和趙戎的《在馬六甲海峽》，這些作品或控訴日軍的暴行，或表彰抗日志士的英勇事蹟，在不同方面表達了作家對日軍的憎恨，同

¹⁸ 馮仲漢主編，《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匯編》（新加坡：亞太圖書、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9），頁128。

時亦融會了反殖民、倡獨立的意識。¹⁹ 另有一些散文緬懷在戰亂中遇害的文人，例如胡愈之紀念郁達夫及《南洋商報》同事的文章。²⁰ 舊體詩方面，除謝松山的《血海》外，在報章上發表的還有沈慶和的〈劫後詩鈔：哭胡君伯揚〉、曾心影的〈劫後星洲〉等較短的組詩。²¹ 這類文學創作和在報章上持續的有關淪陷時期的報導，反映了戰爭陰影在戰後多年仍籠罩於新加坡華人的內心，成為那一代華人無法釋懷的集體創傷記憶。

謝松山的《血海》，乃是林林總總的戰爭回憶書寫之一。他以舊體詩寫作，面對的讀者顯然是文人及知識分子，但每首詩後所附的白話注文，又便於普羅大眾閱讀。謝松山甚至曾把這些注文單獨出版於《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匯編》一書之中。²² 這種出版手段可以證明，謝松山是有意把文人讀者與普羅讀者都包攬在內，用較為純雅的詩以及較為通俗的文，讓知識階層不同的讀者都能感受到戰爭的慘烈與禍害。

三、創傷記憶與「詩史」傳統

戰後有關新加坡淪陷時期的著作，無論是史料整理還是文學創作，都可視為一種創傷記憶。而以舊體詩形式寫成的《血海》，與以白話文撰寫的回憶錄、小說等比較，則更背負了一個傳統的書寫民族苦難史的烙印。從杜甫記述「安史之亂」的「詩史」開始，經過宋代汪元量（約 1241-約 1304）吟詠宋亡史事的紀事詩，下至明清以來顧炎武（1613-1682）、吳偉業（1609-1671）、黃遵憲、康有為等描述國族危亡的作品，中國的「詩史」傳統似乎便與民族苦難和創傷書寫息息相關。陳平原即指出：「『詩史』詩人這麼一個稱號，不單屬於杜甫，而且屬於一批生活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用詩筆記下民族的苦難與屈辱，表達民族的悲憤與希望的愛國詩人。」²³ 遠的暫且不表，以逃亡者身分流寓新、馬的康有為，在其有關南洋的詩

¹⁹ 黃孟文、徐迺翔主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頁 83-94。

²⁰ Yeo Song Nian (楊松年) and Ng Siew Ai (黃秀愛),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s Reflected in Singapore-Malaya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5-49)," pp. 109-114.

²¹ 沈慶和、曾心影的作品俱發表於《南洋商報》副刊「和平」，見沈慶和，〈劫後詩鈔：哭胡君伯揚〉，《南洋商報》，1946年11月21日，第7張；曾心影，〈劫後星洲〉，《南洋商報》，1947年4月17日，第11張。

²² 馮仲漢主編，《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匯編》，頁 126-143。

²³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說「詩史」〉：

作中便表現出強烈的創傷意識和紀史意味。他的詩題往往長達數十字，有時加上說明性的小序，帶有明顯的紀事目的或書寫「詩史—我史」的傾向，詩歌內容則散發著揮之不去的憂國傷逝的情懷。²⁴ 戊戌政變的創痛，亡命天涯的孤淒，時刻讓他感受到國族前途與自身命運之間存在著糾纏不解的瓜葛。他的南洋詩總是透過風景與事典回望中原，同時又以其悲情的境遇和「帝師」的身分，鼓動海外華人對中國政治的關懷甚至參與。是以高嘉謙在其南洋詩中看出一種創傷式的民族主義想像。²⁵

《血海》紀錄創傷經驗的意圖更為明顯。謝松山以報人的身分採訪、報導檢證大屠殺戰犯的審判，倖存者及證人驚心動魄的憶述，使他精神上受到極大的震撼，何況他亦曾經歷過淪陷時期的種種苦難。因此他對證人供詞的記載、轉寫便不止是客觀的新聞報導，而是帶有極強的主觀情感與道德判斷。龔鵬程在研究中國「詩史」概念時稱，與西方偏於想像性寓意、帶有宗教精神的史詩不同，「詩史代表一種價值觀念，而此觀念之發軔，往往在歷史文化意識勃興之際。論者渴望在詩中展現作者的人文精神與文化理想，紀錄並批判一代史事。」²⁶ 蔡英俊亦持相同的看法，認為「『詩史』此一概念所指陳的歷史事件的面向，是《春秋》式的對於事件意義與價值的解釋或判斷，而不是以情節構造與鋪展為主的敘述模式。」²⁷ 這種對史事的價值判斷，可視為謝松山創作《血海》的核心元素之一。

更進者，《血海》一書無論從撰寫動機、形式和內容而言，都能與前代書寫社會動盪、民族悲劇的紀事詩相提並論。作為受過傳統詩學影響的詩人，他或許亦認為自己負有描繪亂世的責任。孔穎達 (574-648) 在《毛詩正義》中，對〈詩序〉所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如是解釋道：「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²⁸ 徐復觀 (1903-1982) 據此推演為「詩人的個性即是詩人的社會性」，「天下、國家的悲歡

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頁 260。為《血海》第三版作序的曾鐵忱，亦指出謝松山的著作使人想起杜甫。謝松山，《血海》，序頁 4。

²⁴ 黃錦樹，〈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收入吳盛青、高嘉謙主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頁 160-162。

²⁵ 高嘉謙，〈帝國、詩與孔教的流亡：論丘逢甲與康有為的南洋詩〉，頁 195-204。

²⁶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頁 32。

²⁷ 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3（新竹：2009），頁 240。

²⁸ 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四部備要》經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7，阮刻本重印），頁 49。

憂樂」皆凝注於詩人之心，「以形成詩人的悲歡憂樂」，詩人復「挾帶著自己的血肉把它表達出來」。如是言之，則詩人的個體意識，即成為集體意識的縮影，因為他實際上是「把無數讀者所蘊蓄而無法自宣的悲歡哀樂還之於讀者」。²⁹ 這種看法在蔡英俊的論著中再次得到肯定。他以屈原為例，說明個人對戰亂的抒懷，乃集體苦難的一份見證。³⁰ 如此說來，詩人也就成為了其所屬群體的代言人，尤其是在非常時期，更要肩負哀生念亂的責任。是以對謝松山而言，雖然在和平時代有報章、回憶錄等媒介擔當存史的功能，他似乎覺得仍有必要盡一下詩人紀史、論史的職能。何況他還兼有報人的身分，則這種使命感便更為強烈了。³¹ 而採用舊體詩的形式，則是直接呼應紀述苦難的「詩史」傳統的一種表現。

中國詩人這種記述世亂的使命感，與西方創傷記憶 (traumatic memories) 理論中提及的「回憶的責任」(the duty to remember) 可謂不謀而合。曾在納粹集中營飽受折磨的義大利猶太裔作家普里莫·萊維 (Primo Levi, 1919-1987)，曾指出「記憶的責任」，乃是要記住納粹大屠殺是一個關乎道德與政治的問題，而且對建構人類的未來尤為重要。³² 保羅·利柯 (Paul Ricœur, 1913-2005) 復在其〈記憶與遺忘〉(“Memory and Forgetting”) 一文中重申：「記憶的責任不但包括對過去深度的關注，還在於把過去事件的意義傳達給下一代。」³³ 因此紀錄和評價史事者，便負有維護道德規範與教育下一代的責任。這與中國「詩史」傳統強調的道德判斷幾乎若合一契。宋人胡宗愈 (1029-1094) 的〈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即說過：「先生〔杜甫〕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³⁴ 換言之，杜甫的「詩史」作品，並非是單純的紀史，而是含有極強的道德意義。

²⁹ 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2006），〈傳統文學思想中詩的個性與社會性問題〉，頁 2-3。

³⁰ 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頁 248。

³¹ 陳平原認為在「和平歲月，因為有史官修史，詩人的擔子似乎輕些。」但在外族入主中原以後所修的史書，自然難以記載前朝臣民抗敵的英雄事蹟。詩人在此時便自覺要「擔負起寫離亂頌豪傑、拾遺事表逸民的重擔」。陳平原，〈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頁 272。

³² Barbara A. Misztal,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Maidenhead,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4.

³³ “The duty to remember consists not only in having a deep concern for the past but in transmitting the meaning of the past event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bid.

³⁴ 轉引自陳平原，〈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頁 270。

創傷記憶理論亦指出，人們都試圖將沉痛的歷史經驗遺忘 (desire to forget)，但集體的創傷記憶（如納粹大屠殺）卻使他們覺得有必要將可怕的經驗紀錄下來。³⁵ 這不僅有警世作用，而且有治療創傷的目的。「記憶不但能引起創痛，它還能治愈創痛」。³⁶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早就提出悼念 (mourning) 是一種可以幫助人們克服創傷的方法。因此重複地表達哀傷和承認慘痛的過去為歷史的一部分，乃是脫離精神創痛的必要一步，受創者亦可以由此回復人的尊嚴。戰爭紀念館和資料庫的建立，以及各種供人們抒發精神創痛的公共空間 (public space) 的出現，便是要把個人零碎的記憶集合、重構和展示出來，以有效地達到警世的作用。³⁷ 謝松山的《血海》以及戰後新加坡出現的大量有關淪陷時期的史籍和回憶錄，顯然同樣有警世甚或治療創傷的目的。為《血海》一書作序或題詞者，便都曾揭示該書道德判斷方面的意義和警世功能：

茲篇之作，於史家之外，可謂兼得風人之旨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讀是書者，或將有感於斯言。（陳振夏〈序二〉，序頁 21）

我希望戰爭販子，軍火商人有機會讀這本書，看他們所造的罪孽是多麼深重。假如他們能幡然悔悟，放下屠刀，使世界和平增加一些力量，那麼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很有意義。（連士升〈序三〉，序頁 22）

〔是書〕義正辭嚴，直秉董狐之筆，窮形盡相，如燃溫嶠之犀；血淚盈盈，歷千秋而不滅！海天淼淼，亘萬古而猶腥。……惟祈血化萇宏，盡洗昭南之污跡，更望海填精衛，永平星島之迴潮。（管震民〈序四〉，序頁 24）

義正辭嚴良史筆，窮形盡相賴君傳。（歐陽雪峰〈松山先生贈所著血海因掇拾管老題序語意奉呈一律〉，序頁 27）

管震民 (1880-1964) 的序文結尾，隱然有渴望撫平精神創傷的含義在內。其他作序或題詞者，則多表示不能忘懷這段血海深仇，然則此書的面世，似乎只能再次勾起

³⁵ Dena Elisabeth Eber and Arthur G. Neal,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earch for Identity," in Dena Elisabeth Eber and Arthur G. Neal (eds.),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ed Truths and Competing Realities*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2001), p. 175.

³⁶ "Memory not only causes pain, it heals." Thomas Butler, "Memory: A Mixed Blessing," in Thomas Butler (ed.), *Memory: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Mi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 26.

³⁷ Barbara A. Misztal,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pp. 141-142.

他們內心的傷痛，蓋由於戰爭的禍害過於刻骨銘心矣。謝松山的再版序，則特別強調人類的同情心，稱這是「人群進化的里程碑，是社會互助的有力支持，人類苟無這種同情心，世界將立即陷於毀滅。」而讀此書者，自然會對「千千萬萬無故被驅往郊外或海濱活活殺死的同胞表示無窮的哀悼」。³⁸ 這頗能令人連繫到「記憶」乃有助建構人類的未來一說，人的尊嚴當亦能透過對死難者的同情與紀念、對施暴者的譴責等道德層面的裁決而重新樹立起來。

四、「詩史」意識的形成：由〈昭南竹枝詞〉至《血海》

謝松山先後以三種不同的標題和出版形式發表《血海》內的作品。這些不同的標題，展示了謝松山創作心態和價值判斷的轉變。從報章上較為世俗化的「竹枝詞」，至紀史意味更為濃厚的「紀事詩」，最後到結集成書、題目令人驚心動魄的《血海》，他的「詩史」意識逐步提高，態度越趨凝重，華人社會的反應亦越大。茲按出版次序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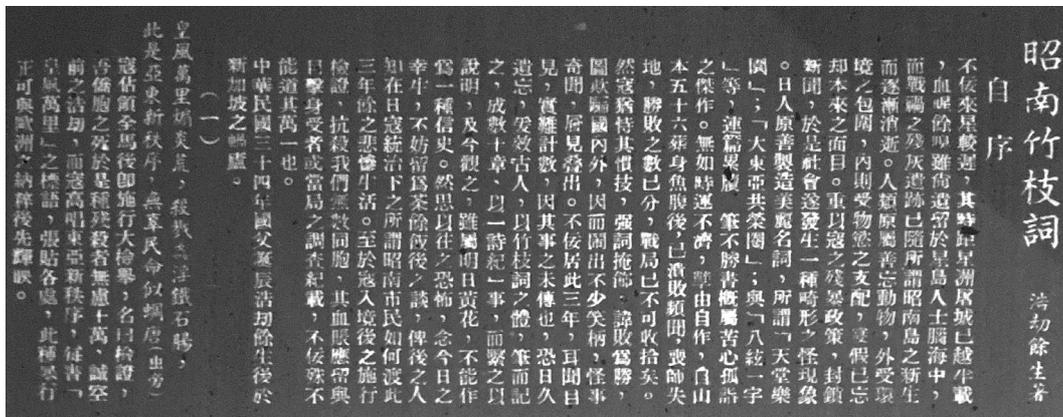
(一)〈昭南竹枝詞〉

謝松山首次發表《血海》中的作品，是在 1946 年。當時他署名浩劫餘生，以〈昭南竹枝詞〉的標題將五十一首作品，由 6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陸續發表於《南洋商報》的副刊「和平」（見圖二）。³⁹ 〈昭南竹枝詞〉的體例，基本上與後來發表的版本一致，即都是以七言絕句的形式賦詩，再在每首絕句後附以詳釋，而內容則略有增減。⁴⁰ 這批作品即組成了後來〈昭南紀事詩〉的下半部。

³⁸ 謝松山，《血海》，序頁 11。

³⁹ 這五十一首〈昭南竹枝詞〉，後被收錄於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中國以外唯一竹枝詞匯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頁 249-256。

⁴⁰ 其中發表於 6 月 28 日的第四十九首，後來不載於其他版本中。詩云：「風瀟瀟兮雨瀟瀟，三載經營一旦焦。坐視金錢化烏有，忍心唯向內傾銷。」注文曰：「三載經營，化為烏有，痛心之餘，無可奈何。忽聞內地英軍未到，軍票依然通行，雖物價高昂，然採辦當較坐視變成廢紙為佳，於是成千累萬網而向內地或鄰近島嶼傾銷，羅里車電船，絡繹不絕，此種『移禍東吳』戰略雖有成就，然受害者依然是自己同胞耳。」浩劫餘生（謝松山），〈昭南竹枝詞〉，《南洋商報》，1946 年 6 月 28 日，第 4 張。按：此首被刪去，或與首句平仄格式不夠規範有關。



圖二：謝松山在《南洋商報》發表之〈昭南竹枝詞〉⁴¹

〈昭南竹枝詞〉原有一篇自序，開首謂作者來新加坡時，「距星洲屠城已越半載」，故未有經歷大檢證一役。繼指島上民眾，「外受環境之包圍，內則受物慾之支配，寢假已忘卻本來之面目。重以寇之殘暴政策，封鎖新聞，於是社會遂發生一種畸形之怪現象。」他又自述創作的緣由說：

不佞居此三年，耳聞目見，實難計數。因其事之不傳也，恐日久遺忘，爰效古人，以竹枝詞之體，筆而記之，成數十章，以一詩記一事，而繫之以說明，及今觀之，雖屬明日黃花，不能作為一種信史。然思以往之恐怖，念今日之幸生，不妨留為茶餘飯後之談，俾後之人知在日寇統治下之所謂昭南市民如何渡此三年餘之悲慘生活。至於寇入境後之施行檢證，坑殺我們無數同胞，其血賬應留與目擊身受者或當局之調查記載，不佞殊不能道其萬一也。⁴²

可見〈昭南竹枝詞〉的創作，雖意在紀史，但作者卻將之與「信史」區別開來，這與後來《血海》一書中，作序者每每將之與史料相提並論，甚而稱之為「史詩」，大是不同。而〈昭南竹枝詞〉的序文一方面指控日人的暴行，一方面又不乏輕描淡寫的話語，如「明日黃花」、「茶餘飯後之談」等，似乎淡化了日佔時期的血腥，頗有文人記述異聞軼事的味道。或許作者亦意識到用辭的不妥，後來在《血海》的

⁴¹ 同前引，1946年6月6日，第4張。

⁴² 同前引。

自序中，這些語句都被刪除了。

自唐代劉禹錫仿效民歌體的「竹枝詞」始，這一體裁便常被文人用來記述異地文化、風俗趣聞，其中頗帶有作者主觀性的評論或自我情感表達。新、馬的華文報章，便曾出現大量的竹枝詞或類似的舊體詩作品。據李慶年的統計，自 1888 年至 1950 年，即有四千多首竹枝詞體的作品面世（但有不少作品與新、馬本土無關）。對於「竹枝詞」，李氏在內容方面的定義是：「凡是描述風土人情、地方習俗、氣候物產、社會民生、政治動態、典章制度，都可以劃入竹枝詞範圍。」可謂相當寬泛。而風格方面則「一般表現得隨意不拘，經常挾帶著詼諧幽默，甚至是嬉笑怒罵」。⁴³ 謝松山的〈昭南竹枝詞〉，起初大抵欲按照「竹枝詞」體的思維方式撰寫，其中有些篇什即紀述了淪陷期間新加坡社會呈現的「怪現象」，頗有「竹枝詞」嬉笑怒罵的特色，如第二十九首云：

帆檣林立善經營，門戶往來無白丁。巴結祇須煙酒錶，莫愁社會不揚名。（頁 86）

自注云：「長袖善舞，乃商人本色，但舳艫雖多，尚需要一種秘術，即巴結皇軍是也。巴結之物無他，名貴之歐美香煙美酒與瑞士製之水〔手〕錶。由巴結進而為勾結，勾結愈多，而獲利愈厚，而社會上遂不愁無人知矣。」⁴⁴ 淪陷時的新加坡，的確成了名副其實的「異地」，而華商勾結日人的行為，亦不可謂不「怪」，似乎這些都與「竹枝詞」的創作方向相符。但除此之外，〈昭南竹枝詞〉中卻有不少令人觸目驚心、充滿血淚的內容，與「竹枝詞」這一名稱所蘊含的世俗味頗不相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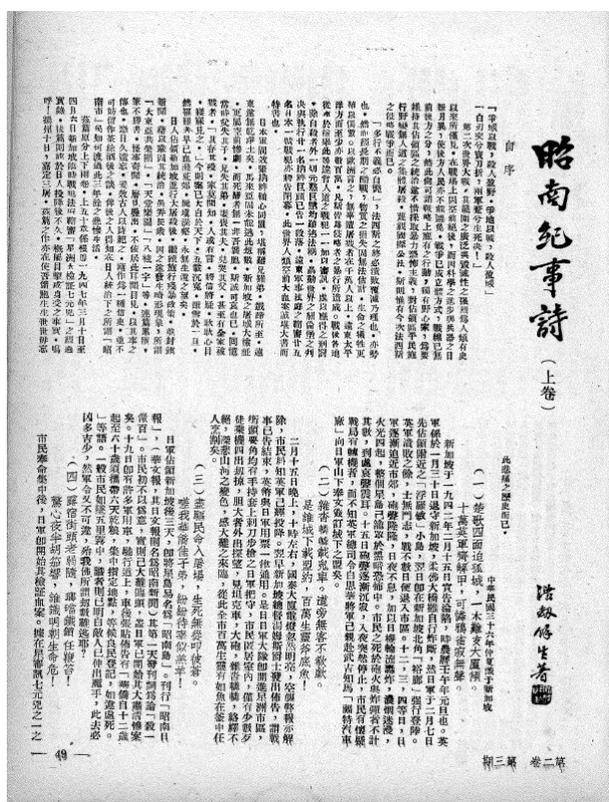
（二）〈昭南紀事詩〉

〈昭南竹枝詞〉發表後的第二年，即 1947 年，新加坡臨時戰犯法庭在 3 月 10 日至 4 月 6 日審判日軍策動「星洲大檢證」的七元兇，由英國派出華特少校 (Frederick Ward) 為主審官，助控官為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法律顧問林泉和律師 (Richard Lim Chuan Hoe, ?-1968)。謝松山或以《南洋商報》記者的身分，出席並紀錄了審判的內容，就算不曾親身出席，大抵亦審閱了新聞稿件。之前他在〈昭南竹枝詞〉自序中，稱因沒有經歷過大檢證，故而無法「道其萬一」。經此審訊後，從

⁴³ 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中國以外唯一竹枝詞匯編》，〈南洋竹枝詞概說〉，頁 7、2。

⁴⁴ 浩劫餘生（謝松山），〈昭南竹枝詞〉，《南洋商報》，1946 年 6 月 20 日，第 4 張。

受難證人的控詞及日軍戰犯的口供中，他獲悉了日軍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由此寫成了五十首同樣附有注文的詩作，再加上原來〈昭南竹枝詞〉的五十首作品，合共一百篇，以〈昭南紀事詩〉的名稱，分上、下兩卷發表於《南洋雜誌》1948年5月第二卷第三期及7月第二卷第四期，署名仍是浩劫餘生（見圖三）。⁴⁵ 上卷即是「鞠審『星洲大檢證七元兇』之經過實錄」，卷後附有新加坡地名的西文音注，這些音注在後來的《血海》一書中已不復見。



圖三：謝松山在《南洋雜誌》發表的〈昭南紀事詩〉⁴⁶

大概因為情緒受到審判內容極大的衝擊，謝松山為該什所寫的自序，除篇幅較原〈昭南竹枝詞〉為長外，最顯著的不同，是加強了對日軍在二次大戰中所犯罪行

⁴⁵ 浩劫餘生（謝松山），〈昭南紀事詩（上卷）〉，《南洋雜誌》，2.3（新加坡：1948），頁 49-55；浩劫餘生（謝松山），〈昭南紀事詩（下卷）〉，《南洋雜誌》，2.4（新加坡：1948），頁 74-78。

⁴⁶ 浩劫餘生（謝松山），〈昭南紀事詩（上卷）〉，頁 49。

的指控，而提及新加坡的屠城大檢證時，語調尤為沉痛：

死難者無一非吾僑胞，斯誠可哀也已。回憶當時父失其子，兄失其弟，妻喪其夫，兒哭其父，甚至有全家被戮者。「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耿耿心目，寢寐見之。」今則案已大白於天下，五載沉冤，雖雪於一旦，然罹難者早已血濺荒郊，屍填溝壑，永無生還之望矣。⁴⁷

而前此在〈昭南竹枝詞〉序文中所稱，所紀「不能作為一種信史」之語，在此則易為「藉作為一種信史」，顯然是有審訊的記錄作依據，讓謝松山自信作品可以成為史料。在序文末尾，作者復云：「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茲篇之作亦在使吾僑胞生生世世毋忘此悲痛之歷史而已。」以詩紀史，復以史為鑒的用意頗為明顯。然而，「並不可妨留作茶餘酒後〔筆者按：原為『飯後』〕之談」這句略嫌輕鬆的句子，仍保留在序文中，暴露了作者原來寫作「竹枝詞」的思維方式。無論如何，從略帶筆記意味的〈昭南竹枝詞〉，進化到具有「詩史」意識的〈昭南紀事詩〉，作者在創作內容與道德判斷方面，都呈現了一種自我提高的態勢。

「紀事詩」的名稱本身，相對於「竹枝詞」亦較為嚴肅。最遲在清代，「紀事詩」這種被詩人賦予詩史意識的體裁，已逐漸成形。追源溯始，以大型七絕聯章形式出現、描寫政局動盪的詩歌，在宋代即已誕生。首先有北宋末年劉子翬（1101-1147）的〈汴京紀事二十首〉，紀述北宋京城的浮華市況與政治興替。⁴⁸ 然而這組紀事詩雖有「紀事」之名，卻沒有後世紀事詩所見的注文。洎乎南宋末年，汪元量的〈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同樣是以七絕聯章的形式，吟詠宋亡史事，具有濃厚的「詩史」意識。不過每首詩後仍沒有注文，有亦是後人為其所作的補注。⁴⁹ 至清代，詠史七絕聯章體大盛，有些作品雖無「紀事詩」之名，而形式、作意都可算是「紀事詩」。例如沈嘉轍、厲鶚等成書於雍正元年（1723）及二年的《南宋雜事詩》共七百首，追述南宋一百五十年間杭州風貌史事，所引注書近千種，既有詩又有詳細注文，表達了清初文人對南宋餘杭文化的企慕與想像，以及

⁴⁷ 同前引。

⁴⁸ 王利民，〈劉子翬紀事詩考論〉，《文學遺產》，6（北京：2014），頁 53-55。

⁴⁹ 有關汪元量的詩作研究，見方勇，〈走筆成詩聊紀實：簡論南宋遺民汪元量的詩歌特徵〉，《天中學刊》，14.4（駐馬店：1999），頁 35-39。

對當代政治現實的疏離感，堪稱是「紀事詩」的典範。⁵⁰ 另一種是清末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二百首，具記日本典章制度、民俗風物，詩、注並存。鄭毓瑜認為，這種形式是把「舊詩語與新事物的描述相互對照」，即詩本身用上傳統的典故來借喻新事物，而注文則是關於新事物的現代注解。⁵¹ 至於洪亮吉 (1746-1809) 在 1799 年謫戍伊犁期間所寫的〈伊犁紀事詩〉，則名正言順用上「紀事詩」之名，專記新疆風貌與見聞，並附有簡略的注文。而民國時期劉成禺 (1873-1952) 記述袁世凱稱帝亂政的《洪憲紀事詩》，引起的社會轟動更大，以致劉成禺後來將一部分詩作附以詳細注解，以《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的名稱重新發表。⁵² 謝松山將其作品命名為〈昭南紀事詩〉，或許是受到《洪憲紀事詩》的啟發。綜合「紀事詩」的發展情況而言，詩人在創作這種以紀事、紀史為主的詩歌體裁時，都有意識地將史料納入其中，使作品帶有強烈的證史、補史及論史傾向。

〈昭南紀事詩〉發表後，即引起一些新、馬文人的注意。1948 年在《南洋商報》上，便先後刊登了五位詩人有關〈昭南紀事詩〉的題詠共七首，這五位詩人是王受天 (1881-1963)、何桂棧、檳城鳳果、謝雲聲 (1900-1967)、涪州一笑。⁵³ 其中何桂棧是《南洋商報》編輯，謝雲聲任職教育界，後為新聲詩社的社長。這些題詠後來都收入《血海》一書。茲錄謝雲聲的兩首七絕題詞如下：

讀竟昭南紀事詩，有如水膽碎當時。他年修纂星洲史，淪陷經過賴補遺。
盡將暴行集長篇，剝棗層層詠快然。嘉定三屠無此酷，重溫舊事淚如泉。
(頁 26)

前一首著重提到該什作品的補史價值，後一首表達了讀者個人（其實也是其他倖存者）的創傷回憶。透過詩作重溫這段慘烈的舊事，無疑會再次觸痛讀者內心那道未

⁵⁰ 高荊梅，《〈南宋雜事詩〉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⁵¹ 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典故運用為例〉，收入吳盛青、高嘉謙主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頁 486。

⁵² 劉成禺、張伯駒，《洪憲紀事詩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吳德鐸〈前言〉，序頁 1-4。

⁵³ 王受天，〈讀昭南紀事詩有感並呈浩劫餘生先生〉，《南洋商報》，1948 年 11 月 9 日，第 9 張；何桂棧，〈讀昭南紀事詩〉，《南洋商報》，1948 年 11 月 9 日，第 9 張；檳城鳳果，〈讀昭南紀事詩有感即呈浩劫餘生先生〉，《南洋商報》，1948 年 11 月 27 日，第 9 張；謝雲聲，〈讀「昭南紀事詩」〉，《南洋商報》，1948 年 11 月 18 日，第 9 張；涪州一笑，〈步王受天君詠昭南紀事詩〉，《南洋商報》，1948 年 12 月 14 日，第 9 張。

曾癒合的傷痕，但或亦有助其抒發壓抑已久的悲憤。

(三) 《血海》

1950年3月尾，《南洋商報》將謝松山的〈昭南紀事詩〉以《血海》的名稱出版，列為《南洋商報》叢書第八種（見圖四）。初版五千冊，不一日即全數售罄。4月15日復再版加印三千冊，不兩日又告售罄。而各地詢購者尚「源源而來」（按：再版一書，筆者未曾寓目）。⁵⁴ 為滿足讀者需求，《南洋商報》在同年10月17日發行《血海》第三版，資料稍有補充，且加入了「歷史性照片約二十幅」，以及新的序文和題詞。⁵⁵ 《血海》初版的詩作，較〈昭南紀事詩〉多了六首，合共一〇六首，而第三版又增多了兩首，合共一〇八首。⁵⁶ 而詩後所附的注文，有不少在初版時已較〈昭南紀事詩〉頗有增加。謝松山又將注文另外抽出，以〈血海昭南〉的標題刊登於馮仲漢所編的《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匯編》一書中。由此書的一版再版，可知作為報界龍頭的《南洋商報》，在出版、宣傳和推動該書的銷售過程中，起了積極的作用。該書亦在當時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引起極大的反響，勾起了經歷過這段慘痛歷史的華人的集體記憶，這一點從該書的銷售情況即可見一斑。然而事過境遷，今日的新加坡人似乎已忘記了此書的存在。

〈昭南紀事詩〉易名為《血海》，顯示出謝松山進一步認識到作品所蘊含的道德意義和集體創傷意識。而名稱亦較前更為嚴肅沉痛，且具有控訴意味，很容易讓人想到日佔時期腥風血雨的情境和華僑對日寇的血海深仇。初版的序文，除了謝松山在〈昭南紀事詩〉的原序外，尚加入了曾心影、陳振夏、連士升、管震民四篇。另有管震民的七言絕句題詞十二首，及之前所述王受天等五人的題詞。這些題序者在日佔時期多有過慘痛的經歷，對書中的描述感同身受。如檳城詩人管震民的夫人、哲嗣和長孫都亡於淪陷時期（是以他自署「蒙難家屬」）。毋怪他們的序文都寫得義憤填膺，加重了《血海》一書的控訴色彩。如曾心影（時任《南洋商報》督印兼主筆，曾任新聲詩社社長）的序文有云：

⁵⁴ 〈《南洋商報》叢書第八種謝松山著《血海》本月杪出版〉，《南洋商報》，1950年3月12日，第5張；〈謝松山著《血海》明日再版發行〉，《南洋商報》，1950年4月14日，第5張；〈謝松山著《血海》再版亦已售罄〉，《南洋商報》，1950年4月18日，第5張。

⁵⁵ 〈謝松山著《血海》第三版後日發行〉，《南洋商報》，1950年10月15日，第5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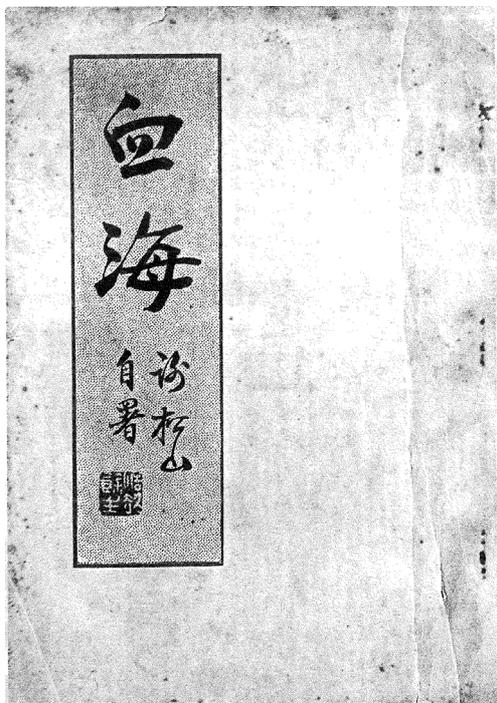
⁵⁶ 《血海》初版中的第三、三十一、三十二、五十九、六十、七十一首為新增。第三版中第三十三、三十四首為新增。

四晝夜之間，飲彈伏屍於海濱者，蓋不知其幾萬人，風暴雨嘯，頃刻而盡。哀我無罪羔羊，當彼屠戮芻狗，追想當時恐怖，至今魂魄猶悸！……書名血海，沉痛無窮，蓋紀三年餘之蒙難，哀九洲府之劫運……（曾心影〈序一〉，序頁 17）

陳振夏的序文則云：

當是時，吾僑處身鐵蹄下，如入九幽地獄，笑齒啼顏，盡成臯狀，蹊步才蹈，荊棘已生，而向之視大和民族為文明國人者，至是乃始悚然於倭奴面目之猙獰。……及今談及，凡有血氣，猶莫不髮指，吾知劫後餘生之同僑，從此父詔其子，兄誥其弟，對茲血海深仇，必當永矢不忘矣！（陳振夏〈序二〉，序頁 20）

諷刺的是，當今許多新加坡華人，對這段「血海深仇」，都已逐漸淡忘了。



圖四：《血海》初版的書影

第三版的序文，新增了謝松山的〈寫在第三版出版前〉、〈《血海》再版序〉，和《南洋商報》編輯曾鐵忱、著名書法家潘受（國渠，1911-1999）的序文以及同樣任職於《南洋商報》的作家姚紫為第二版所寫的文章〈血的紀程碑：寫在謝松山先生《血海》再版之前〉。另外尚附有潘受的〈菲律賓碧瑤山美國軍營過日本大將山下奉文乞降處〉一詩，和歐陽雪峰、丘桐士、梁懋麟、謝廷生、陳習庭的題詩共十二首。其中序文每每扣緊「血」的主題，大書特書，凸顯華僑在日佔時期的悲慘經歷和反抗精神。潘受的序文尤其「血」字連篇：

這真是一個血的世紀。任何時，可以聽得到血聲；任何地，可以見得到血色。……松山先生寫的這一冊《血海》地限於新嘉坡，時限於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其實，只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創造的汪洋血海之一斷港支流，何足以盡其涯涘？……隔一層薄紙，我們分明看見無數血肉模糊的鬼影，散血髮而怒衝，張血目而怒視，攘血臂而怒指。我們分明聽到他們不斷切血齒，不斷頓血足，不斷全體一致作血的抗訴。……我們憑弔血，我們謳歌血，我們咀咒血，我們百叩百禱：以血止血。（潘受〈謝松山先生《血海》三版序〉，序頁 7-8）

這些語調沉痛激昂的序文（和詩歌），代表了那一代華僑血淋淋的集體記憶，而謝松山的《血海》則替他們把壓抑多時的精神創痛與憤慨傾吐出來。我們可以想像，正因為「血海」二字能夠真實反映華人在日佔時期的慘況，故特別能勾起華人對那一段歷史的回憶。謝松山在再版序中就提到，這部書在數日之內售罄，「是一種人類共鳴的表現，因為書中所記載的每一段故事，太殘酷了，太離奇了，時間並不過得這麼久，這血淋淋的債還是很新鮮的。」⁵⁷ 假使謝松山是以傳統雅正的《昭南紀事詩》而非《血海》為名出版是書，則其在華社引起的反響或許不會如是之大。由此說來，在出版之前，謝松山（也許還有《南洋商報》同仁）對書名是經過一番斟酌的。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書名的改易卻把與舊體詩有關的提示抹去了。「竹枝詞」與「紀事詩」，讓人一望而知作品是舊體詩，而《血海》一名卻有小說、回憶錄的意味，難以看出它與舊體詩的關聯。

謝松山自己既提到《血海》一書可以作為一部「信史」，必亦意識到作品與描寫民族苦難的中國「詩史」傳統的關係。實際上，作序者亦多以「史詩」目之，例

⁵⁷ 謝松山，《血海》，〈《血海》再版序〉，序頁 11。

如：

茲篇之作，於史家之外，可謂兼得風人之旨。（陳振夏〈序二〉，序頁 21）

這一百首詩從文字到精神是寫實之作，近於史詩。（連士升〈序三〉，序頁 22）

浩劫餘生（謝君筆名），手輯是篇，不為無病之呻吟，而作有憑之實據……義正辭嚴，直秉董狐之筆。（管震民〈序四〉，序頁 24）

謝松山先生……和平後作史詩一百有六首……（曾鐵忱〈悲哀往事記年年——為松山先生所著「血海」三版獻詞〉，序頁 3）

輜軒若訪華僑事，記取編存史乘中。（謝廷生〈讀家先生松山寄贈所著血海集後〉，序頁 28）

曾鐵忱將《血海》與杜甫描寫安史之亂的作品相提並論，指出它可以「成為不朽的史詩」。《血海》中提到的內容，的確有許多文獻可徵，其「以詩證史」、「以詩紀史」或「以詩補史」的傾向甚為明顯。然而，「詩」並不等於「史」，「史」亦不同於「詩」，「詩」與「史」之間構成怎樣的張力？謝松山在其作品中如何處理史料與詩的關係？這些是下文要討論的問題。

五、紀事、感事：《血海》的創傷書寫和「詩史」內容

「詩史」之稱，始見於南朝沈約（441-513）的《宋書·謝靈運傳》，⁵⁸ 而「詩史」創作則大成於杜甫。然而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將杜甫的作品視為史料，黃宗羲（1610-1695）早已指出杜詩是「以史證詩」，而非「以詩補史之闕」，且「史固無藉乎詩也」。⁵⁹ 錢鍾書（1910-1998）在《談藝錄》中更清楚闡明「詩」與「史」的區別，認為「史必徵實，詩可鑿空」，即史籍是要按事實來記載，而詩卻加上了作者的想像，而且詩具有「詞句音節之美」，非史籍所能辦，即使詩人有意

⁵⁸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67，〈謝靈運傳〉，頁 1779。

⁵⁹ 黃宗羲，《南雷文定》，《四部備要》集部第 236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5，粵雅堂叢書影印本），前集卷 1，〈萬履安先生詩序〉，頁 10。

識地用「詩」來紀「史」，最終卻仍要按照詩的審美方式來撰寫。⁶⁰ 在〈《宋詩選注》序〉中，錢鍾書又對紀事之詩作了更明確的闡釋：

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唯一衡量。也許史料裏把一件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裏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敘，那末，雖然它在內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歷史記錄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韻的文件。⁶¹

簡而言之，無論「詩」是否能證史、補史，它必須要有一定的藝術性，才成其為「詩」，否則便和歷史檔案沒多大分別。這讓筆者想起南朝時期的「文」、「筆」之辨。當時把包括史籍在內的無韻文體稱之為「筆」，而「文」則是蕭繹所稱的「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道會，情靈搖蕩。」⁶² 固然，像《史記》這類頗有文學價值的史書，亦稍近於「文」，但始終不及「詩」那樣講求句子的精練和音節之美。

張暉 (1976-2013)、陳平原等學者，近年對「詩史」創作的特質亦作過一番研究。張暉基本上重申了前人的論說，稱記載歷史是詩眾多功能中的一項，但我們在閱讀這類紀史之詩時，必須「充分明白詩歌是一種特殊的文獻，而非用來簡單證明歷史的文獻材料。閱讀者要充分了解詩歌的體製和美學，掌握語言文字的細微之處……才不至於對詩歌的意義產生錯誤的把握，從而導致對某些歷史信息的誤解。」⁶³ 陳平原則認為中國由於沒有史詩傳統，中國詩人又注重比興與含蓄的寫法，加上中國詩歌高度程式化，使得中國的敘事詩抒情色彩甚濃。而詩人在撰寫敘事詩時又「總在節骨眼上插進自己的聲音，或則抒情，或則議論……這些抒情可能程式化，議論也可能不怎麼高明，可有如水分和血液，畢竟使過於乾枯的軀體顯得富有彈性和活力」。因此中國的「詩史」作品一直保持其特有的藝術魅力，「不曾

⁶⁰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8-39。

⁶¹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序頁 3-4。

⁶² 蕭繹，《金樓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4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4，頁 853 上。

⁶³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 277。

變成有韻的史書」。⁶⁴ 他又指出：

當詩人把具體的歷史事件拉到「後景」，而把個人的主觀感受推到「前景」時，「詩史」便由注重「紀事」轉為「感事」了。⁶⁵

強調「感事」，則可破除簡單的「以詩附史」或「以史證詩」的研究方式，通過作品來「捕捉民族危亡之際的社會心理，以及積澱在詩人主觀感覺中的時代氛圍。」⁶⁶ 陳氏的論說相當具有說服力，但另一方面我們亦不能以同一眼光審視所有的「詩史」作品。在《血海》一書中，若干作品的紀事、感事性質似乎同樣重要，而謝松山有時甚至過於著重紀事，個人的主觀情感反而被置於「後景」，因而削弱了詩歌的藝術特質，幾乎變成「有韻的史書」了。

《血海》第三版中的一〇八首詩，雖無分卷，但大致上仍可按〈昭南紀事詩〉分為前、後兩部分。上半部由第一首至第五十五首，講述新加坡淪陷經過及關於屠城大檢證的審判，以受害人或目擊者的證詞和戰犯的口供為依據，基本上涵蓋了審判的整個過程和細節，日期、時間、庭內的氣氛及聽眾的反應等俱紀錄在案，幾乎等同於一部審訊紀錄。下半部由第五十六首至第一〇八首，即最初發表的〈昭南竹枝詞〉，描劃淪陷時期新加坡的社會狀況與日軍的高壓政策。再加細分，則可臚列如下。

第一至三首：日軍進佔新加坡的情況；第四至六首：屠城大檢證的展開；第七至十一首：戰犯法庭開審及法庭情況；第十二至十五首：日人篠崎護（曾任日佔時期的教育局長）的供詞；第十六至三十四首：檢證倖存者或目擊者作供；第三十五至五十一首：日本戰犯的供詞及辯方律師的辯護詞；第五十二至五十五首：戰犯法庭的判決；第五十六至六十三首：日軍初入新加坡時的情景；第六十四至七十五首：日佔時期新加坡的市況及日人措施；第七十六至七十九首：日本的東亞統治策略；第八十至九十二首：日佔時期新加坡的經濟狀況及日軍對人民的奴役；第九十三至一〇二首：日本在戰場上的失利；第一〇二至一〇八首：日本投降後的情況。除大檢證外，淪陷時期在日軍監督下成立的華僑協會、華僑被逼捐獻的五千萬元「奉納金」、搜括民膏的「浪機關」、勞役人民的「勤勞奉仕隊」、日本軍票等都

⁶⁴ 陳平原，〈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頁 273。有關中國敘事詩的發展受到限制的原因，見同文頁 262-269。

⁶⁵ 同前引，頁 273。

⁶⁶ 同前引。

在作品中有所提及。以下按原〈昭南紀事詩〉的體例，分上下兩部分分析。

(一)屠城大檢證的審判

《血海》的開篇總敘新加坡淪陷，突出英軍潰敗一幕，感事的色彩甚濃。

楚歌四面迫孤城，一木難支大廈傾。十萬英軍齊解甲，可憐鴉雀寂無聲。（頁1）

詩中用上了舊典故、舊詩語來比喻今事，如「楚歌四面」、「一木難支」、「齊解甲」等，揶揄英軍雖兵力雄厚，卻一擊即潰。⁶⁷末句「可憐」一辭，明顯把作者的主觀情感放在了歷史事件的「前景」。詩後的注文則以紀事為主，詳述英軍在1942年1月30日從馬來亞的柔佛退守新加坡，2月7日日軍即佔領新加坡附近之小島「浮羅敏」(Pulau Ubin)，翌日復在新加坡北角——柔佛新山對岸的裕廊(Jurong)登陸。英軍「士無鬥志」，戰不數日便退入市郊。2月12、13、14幾日，日軍迫近市郊。戰至15日，「砲聲漸趨沉寂，僅聞機聲軋軋，間以機關槍聲，入夜突然完全停止」。原來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Arthur Ernest Percival, 1887-1966)已親赴武吉知馬(Bukit Timah)福特汽車廠向日軍司令山下奉文(1885-1946)投降，「十數萬英軍即日變成日軍之俘虜」。⁶⁸日軍攻陷新加坡的過程，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一書載之甚詳，日期、戰況等都有資料可據。⁶⁹

這種先詩後文的寫作方式，旨在先勾起讀者的感性認知（皆因詩有情感導向的作用），表達作者的主觀看法，再以史傳式的注文交代事件的具體細節。讀者在讀畢注文後，或許又回頭看詩，再品味詩中的抒情元素。如此即可從感性、資訊兩方面對事件作出全盤的審視。雖然這樣看似是以「詩」為主，以「文」為輔，但有些讀者卻可能對注文的興趣更大，尤其是當他們無法領會到「詩」的藝術魅力的時候（詩寫得不好，是作者的過失；不會讀詩，則是讀者自身修為的問題）。

⁶⁷ 「十萬英軍齊解甲」一句，化用了五代後蜀花蕊夫人在國亡時寫的一首詩，原詩後兩句為：「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⁶⁸ 謝松山，《血海》，頁1-2。

⁶⁹ 大衛編譯，〈新加坡淪陷史略〉，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1984），頁237-241。另參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pp. 157-185.

謝松山並沒經歷過日軍的屠城大檢證，他是以聽者的身分轉述倖存者或目擊者的證詞。這些證人的憶述顯然極為驚心動魄，其震撼程度足以讓謝松山等聽眾如親臨現場。愛德華·凱西 (Edward S. Casey) 在其有關記憶的論著中指出，聽者會想像自己置身在憶述者所提及的場境或氣氛之中，他被牽引著進入回憶的過程，並設想那些被提及的特定內容為其自身的經驗。回憶者亦每每希望能在同一場合與其他人一起回憶，這些人不僅是聽眾，同時亦分享了自己的回憶經驗。⁷⁰ 檢證大屠殺的證人所憶述的單一事件，與其他證人的證詞組合起來，即重組了大屠殺的始末及細節。謝松山的作品，則不僅是客觀的轉述，而是在想像自己進入大屠殺的場境後，投注了個人感情與道德判斷的「第二層回憶」。讀者則是透過他的文字描述，再去感受現場的情境與氛圍，形成對事件再次一層的回顧。而大屠殺的恐怖，似乎並沒有因這些層遞的創傷回憶有所減弱。

許多史料都指出，日軍的檢證過程相當隨意，並無標準可言，甚至是出於荒謬的理由。⁷¹ 被檢者之後都被押往海濱或郊外屠殺。《血海》有十五首作品徵引了控方證人的供詞，注文大多與《南洋商報》所載一致。⁷² 有關的報導亦見於英文報章《海峽時報》 (*The Strait Times*)。茲舉兩首為例說明。第十六首記載在榜鵝 (Ponggol) 海濱的屠殺事件，詩云：

旁鵝卜卜聞槍聲，慘痛哀號不忍聽。死後投屍葬魚腹，精魂夜夜泣殘更。(頁 16)

注文引證人謝益同的證供，稱在 1942 年 2 月 28 日，於榜鵝八英里處，聞機關槍聲。越數日往海濱，見不少屍首浮於水面，屍體四五具繫成一串，計有數串之多，均係男性。後據附近村人說，是日軍以軍車載往海濱槍殺。⁷³ 另一位證人彭亞

⁷⁰ Edward S. Casey,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5.

⁷¹ Ralph Modder, *The Singapore Chinese Massacre*, pp. 5, 73;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p. 190;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531-532。

⁷² 另外有四首是錄自民間的口述，其中三首因受害人資料不夠詳盡，故難以徵實。另一首（第三十三首）引述嶺東學校校長賴向榮的回憶，其僥幸脫險的經歷，可見於〈東海岸七哩半大山谷下，挖掘出二十一年前被日軍殺害者屍骨〉，《南洋商報》，1962 年 2 月 19 日，第 5 張。證人名單，另見許鈺，〈新加坡大檢證案戰犯審訊〉，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頁 877。該文原標題為〈昭南時代檢證大屠殺案始末記〉，刊於《南洋雜誌》，1.6 (新加坡：1947)，頁 115-118。

⁷³ 謝益同的證供另見 “All-day Gunfire in 1942 Massacre,” *The Strait Times*, 12 March 1947, p. 1.

務，住在榜鵝十二英里處，當日親睹日軍押載四、五十名華人經過，直至海濱，旋聞槍聲卜卜，哀號之聲，慘不忍聞，事後見海邊浮屍不少。⁷⁴ 注文中所引謝益同的證供，與《南洋商報》的報導稍作對比，字句幾乎相同，只是「越數日」變成「越二三日」，「計有數串之多」變成「共有二三串之多」。⁷⁵ 由於謝松山是《南洋商報》的記者，這些報導有可能都是他根據審訊過程撰寫的。但既身兼詩人之職，則他不能一味只作客觀描述。把這首作品的詩文對照，可見七絕前三句大致是寫實，而末句「精魂夜夜泣殘更」，則是謝松山對事件的「感懷」，表明了他的道德立場。

第二十五首乃根據受害人鄭光宇在法庭上的證詞寫成，詩曰：

機槍掃射密如毛，未死輕傷用刺刀。差幸一彈非要害，鬼門關外得生
逃。（頁 25）

此詩語句平實，和前一首相比，徵實的成分居多，而缺乏錢鍾書所說的「鑿空」，或陳平原所謂的「感事」，幾如語句整齊押韻的口述筆記。詩後的注文則交代了事件的細節，稱鄭氏在 1945 年 2 月 21 日偕妻女前往惹蘭勿剎 (Jalan Besar) 接受檢證，次日妻女被釋回。後一日鄭氏與其他人在接受盤問後，被日軍綑縛上車，駛往外嘉東 (Katong) 的丹戎美勝，⁷⁶ 被驅下車後，日軍將彼等用長繩縛手，八人或十二人一排，迫向海濱，再從背後開機關槍掃射。鄭光宇鼻端中一槍，血流如注，於是閉目待死。之後，一日兵持槍至，以刺刀刺向中彈未死者身上，鄭氏佯作死狀，且鮮血滿面，日兵疑其已死，足踏其胸，以刺刀直戳其身旁之傷者，然後離去。鄭氏待天黑竭力掙脫縛繩，匿身在樹叢三四晝夜，恰有被俘英軍的紅十字救傷車駛至，將鄭氏暗中送往陳篤生醫院治療，因而僥幸逃過大難。⁷⁷ 鄭光宇的這段證供，另在《南洋商報》、《海峽時報》、及鄭氏刊登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一書中的文章〈虎口餘生談〉有載。⁷⁸ 《南洋商報》所刊內容字句，

⁷⁴ 謝松山，《血海》，頁 16。

⁷⁵ 〈篠崎昨在星檢證案審訊中述淪陷初期華僑慘況〉，《南洋商報》，1947 年 3 月 12 日，第 5 張。

⁷⁶ 《南洋商報》所載是丹那美拉（原文應為「勝」字）(Tanah Merah)，見〈四位被寇槍殺未死之同僑證述遭槍殺慘狀〉，《南洋商報》，1947 年 3 月 15 日，第 5 張。另《海峽時報》所載亦為 Tanah Merah。見“Massacre Described by Survivors,” *The Strait Times*, 15 March 1947, p. 1. 《血海》一書所載丹戎美勝有誤。

⁷⁷ 謝松山，《血海》，頁 25-26。

⁷⁸ 〈四位被寇槍殺未死之同僑證述遭槍殺慘狀〉，《南洋商報》，1947 年 3 月 15 日，第 5 張；*The*

與謝松山的注文基本一樣，不過鄭氏本人的文章卻沒提及具體被押往何處行刑，且略去了求助英軍紅十字救傷車一段，而加添了他在事後想拯救其他受傷同胞的情形。

像第二十五首那麼質直的詩句，在《血海》的前半部比比皆是，大抵謝松山欲如實紀錄證人供詞的內容，故有時限制了個人「感事」或鑿空的幅度，把事件的描述置在作品的「前景」。即便如此，大檢證的慘烈情況，還是令人不寒而慄。以下的作品，「紀事」、「感事」的元素則相對較為調和：

來時滿載去空空，蕙葛村前血海紅。弱女教師齊畢命，祇餘嗚咽泣寒蛩。（第十八首，頁 18）

舊居忽爾變蒿邨，餓犬爭尋野骨香。一片殘荒迷故道，九天風雨泣殘陽。（第二十三首，頁 23）

網縛成行向死神，陳尸海岸聽沉淪。潛踪縱許如鳧鳥，回首已如隔世人。（第二十六首，頁 26）

這幾首都是前三句根據證人口供敘事，末句以寫景或情語收結，從而表達對事件的看法，抒發作者個人乃至受害群體的感受。事發情形先是被置於作品的「前景」，而後淡出，由「感事」填滿回憶的畫面。

創傷回憶不但牽涉到受害人的不幸遭遇和感受，還包含對施暴者的控訴。《血海》中記述審訊日軍戰犯的作品，即屬後者。日軍戰犯被提控的，除了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已在 1946 年秋在菲律賓馬尼拉遭美國軍事法庭判處絞刑外，尚有七名，分別為：西村琢磨中將、河村三郎少將、大石正行大佐、橫田隆吉中佐、城朝龍少佐，大西覺少佐、久松春治大尉。⁷⁹ 謝松山在描寫有關倖存者的詩篇時，每每帶著同情、哀憤的筆調，而對日軍戰犯，則頗盡申斥、嘲諷的能事。如第十一首詩描寫戰犯法庭開審第一日，七名戰犯列席時之情態道：

Strait Times, 15 March 1947, p. 1; 鄭光宇，〈虎口餘生談〉，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頁 436-438。

⁷⁹ 謝松山，《血海》，頁 7-8；許鈺，〈新加坡大檢証案戰犯審訊〉，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頁 876。按：久松春治在《血海》中作久松春江，查《南洋商報》等，應作久松春治。山下奉文伏法一事，《血海》第八首（頁 8-9）有紀。各戰犯的答辯，亦見於〈大檢証案審訊七元兇實錄〉，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頁 882-893。

猙獰面目七元兇，今日相逢眼倍紅。此是人間劊子手，寢皮食肉罪應同。（頁 11）

作者毫不隱瞞他對七元兇的極度仇恨，詩歌也變成斥罵，而非抒情了。而注文則仔細形容七元兇的「猙獰面目」。如寫第一被告西村琢磨「年約五十餘，雖作階下囚，但目光四射，態度安閒鎮定，若無事然。」第二被告河村三郎「則土頭土腦，口大而斜，神色惶皇，似預見大禍之來臨。」這些對戰犯的形容，同樣見於《南洋商報》，字句幾乎如出一轍，似同樣出於謝松山之手筆。⁸⁰

謝松山提到戰犯在審訊期間諸多詭辯，甚至諉過於人，如第三十九首寫第一被告西村琢磨的供詞。詩曰：

誰坑趙卒縮兵符，辜負昂藏八尺軀。不惜汗顏談武道，罪歸主帥汝知乎？（頁 40）

此詩亦表達了作者批判的態度。首兩句斥責西村大肆屠戮華人，如戰國時秦將白起坑殺趙卒般殘酷。後兩句則記述西村的辯詞，稱屠殺一事，應由上峯負責。又稱山下奉文有權殺任何士兵，「但決不無故屠殺非戰鬥人員。無如當時環境惡劣，不能不執行，我為軍人，祇有服從命令而已。」繼而「大談武士道精神」。主控官華特少校則對其言論加以駁斥，質問武士道可以隨意殺人乎？將殺人之責諉諸上峯，亦合乎武士道精神乎？西村聽後為之「語塞」。這段辯答的內容，亦見於《南洋商報》和《海峽時報》。⁸¹「詩」、「史」之間可以互為參照。

對戰犯的審訊在 1947 年 4 月 2 日作出判決，其中只有河村三郎和大石正行被判絞刑，其餘五犯被判終身監禁。新加坡華人對此定讞大感失望，認為定罪過輕，於是星華集體鳴冤委員會 (Singapore Overseas Chinese Appeal Committee)，決意「繼續搜索日寇屠殺華僑之一切罪證，務使僥倖不死者重審，漏網者追究定罪。」⁸² 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伍伯勝對此亦表達了關注，並去信予新加坡總督金森爵士

⁸⁰ 〈檢證慘案元兇現形速寫〉，《南洋商報》，1947 年 3 月 11 日，第 5 張。

⁸¹ 〈汝知士兵犯罪，罪歸主帥乎？〉，《南洋商報》，1947 年 3 月 21 日，第 5 張；“Accused General Quotes Bushido,” *The Strait Times*, 21 March 1947, p. 1; “Massacre Claimed as Military Operation,” *The Strait Times*, 21 March 1947, p. 5.

⁸² 〈檢證血案定讞難抑僑胞冤憤〉，《南洋商報》，1947 年 4 月 3 日，第 5 張。另見 “Chinese Want Death for Seven Japs,” *The Strait Times*, 5 April 1947, p. 3.

(Sir Franklin Gimson, 1890-1975) 要求英方複審。⁸³ 此事在《血海》第五十三首有載：

生死無端種夙因，空前浩劫已沉淪。可憐千萬犧牲者，猶是家家夢裏人。（頁 58）

詩作對於判決並未直接提及，只是對遇難者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末句借用了唐代詩人陳陶描寫安史之亂的〈隴西行〉，⁸⁴ 雖是想像之辭，卻頗合情理，可見出作者「感事」的筆法。至於注文，則如報章報導那樣，陳述了受難者家屬對於判決的極度不滿，以及鳴冤委員會和伍伯勝與英方的交涉。⁸⁵ 第五十四首同樣反映了華僑不滿的情緒，詩云：

悲哀往事記年年，血染河山跡未乾。安得餘兇齊授首，方伸冤抑到重泉。（頁 59）

這亦是一首以抒情為重的詩篇，和前首一樣，都有很濃厚的創傷色彩。注文則引述新加坡輔政司麥克倫爵士 (Sir Patrick McKerron) 的話，指漳宜監獄尚關押了一千〇九十一名戰爭嫌疑犯，這些人的罪行尚待調查。⁸⁶ 以此呼應了詩中「安得餘兇齊授首」一句。注文後段是謝松山憤憤不平的話：「雖然，死者已矣，何處能得將元兇一一置之以法，以慰死者之英魂哉？」這是對詩末兩句的補充。而注文接云：「今日新加坡之漳宜，丹戎美勝，旁鵝，蜈蚣馬底〔Blakang Mati，按：在今旅遊勝地聖淘沙〕等處，血跡未乾〔即詩篇第二句〕，幽靈無告，徒供後人之唏噓憑弔而已。」這些極為悲憤的話語顯示，謝松山的注文並不僅限於「紀事」，它和詩歌一樣，有時亦把作者的主觀感受移置到文章敘事的「前景」。

大檢證審判的內容無疑相當沉重，謝松山的有關詩作亦每每以紀實為主，顯得較為直白、板滯。前文引過幾首「感事」色彩明顯的作品，以下兩首的抒情味道亦

⁸³ 〈要求檢證元兇應全數處死刑事，總領事積極交涉〉，《南洋商報》，1947年4月15日，第5張。

⁸⁴ 第五十三首末句在〈昭南紀事詩〉中原作「半是深閨夢裏人」。改易後的「家家」更凸顯了遇難人數之眾。

⁸⁵ 謝松山，《血海》，頁58-59。

⁸⁶ 同前引，頁59。麥克倫所言，見〈漳宜監獄日戰犯尚有千零九十名〉，《南洋商報》，1947年4月7日，第5張；“Move to Clear Japs from Changi Gaol,” *The Strait Times*, 6 April 1947, p. 5.

相對較濃，皆因能跳出敘事之外，借寫景來營造事件的悲劇效果，頗接近傳統詩歌借景言情的筆法。用陳平原的話來說，這種抒情模式儘管仍較程式化，但「有如水分和血液，畢竟使過於乾枯的軀體顯得富有彈性和活力」：

東不知兮西不知，當年大石豈頑癡。轟轟雷雨交加響，恍惚庭前草木悲。（第四十三首，頁45）
 梟獍人間憶往年，那堪無法又無天。彼蒼亦下同情淚，鬼氣森森聽悚然。（第四十四首，頁46）

兩首詩分別紀錄了對戰犯大石正行和橫田隆吉的詰問。前半是實筆，後半則轉移到法庭外風雨交加的情景，似乎大屠殺的慘劇令蒼天亦灑下同情之淚。這看來是錢鍾書所謂的「鑿空」手法，然而對照注文，我們卻發現這種「鑿空」，並非完全出於作者的想像，而是借用了一些實際的環境元素來表明作者的立場和情感意識。第四十三首詩的注文說，大石正行在說到名單上的抗日分子乃屬必殺對象時，「天外雷聲突發巨響，使法庭上頓時陰氣沈沈，並有嘶嘶之聲，淒淒切切，一似鬼魂向法庭哭訴冤抑以求昭雪者，旋雷雨交加，聲震屋宇，令人陡憶五年前無數慘死者，不禁毛骨悚然。」⁸⁷ 第四十四首的注文亦有同樣情況：第四被告橫田隆吉作供時，稱本不願執行屠殺命令，但身為軍人，又不得不從，當他說到將華僑名單交與大石正行時，「大石俯首無言，時則庭外大雨滂沱，一若彼蒼對此案冤死者特下同情之淚云。」⁸⁸ 「雷雨交加」、「大雨滂沱」固然是紀實，但這種與事件無關的環境元素在史籍及新聞報導中卻未必會記載下來，帶有強烈情感元素的「恍惚庭前草木悲」，更不會出自嚴謹的史家之筆。英文報章《海峽時報》的報導即沒有關於天氣的描述。⁸⁹ 但在《南洋商報》，對於雷雨大作一事卻有幾乎一模一樣的描述。⁹⁰ 如果這則報導是謝松山所撰，則他顯然亦把自己的主觀情感，作為新聞報導的一部

⁸⁷ 謝松山，《血海》，頁45。然而這首詩提到的戰犯或有誤，在《南洋商報》等處作橫田隆吉而非大石正行。見〈雷雨交加嘶嘶聲作響，觀審檢證案者毛骨悚然〉，《南洋商報》，1947年3月25日，第5張；同文另見〈大檢証案審詢七元兇審錄〉，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頁889。

⁸⁸ 謝松山，《血海》，頁46-47。

⁸⁹ “Oishi Can’t Recall,” *The Strait Times*, 24 March 1947, p. 1; “Japanese Order Not ‘Gallant,’ Accused Says, ‘I Did Not Like It,’” *The Strait Times*, 25 March 1947, p. 7.

⁹⁰ 〈檢證血案定讞難抑僑胞冤憤〉，《南洋商報》，1947年4月3日，第5張。另見“Chinese Want Death for Seven Japs,” *The Strait Times*, 5 April 1947, p. 3.

分呈現給讀者了。詩人、記者、史家的身分，在此合而為一。「紀事」與「感事」，亦兼而有之。同時我們亦可以看出，華文報在報導審判的情況時，持論立場遠較英文報鮮明。原因或由於雙方記者受過不同的新聞撰寫訓練，但更有可能的是，因為華人是受大檢證的主要受害族群，作為華社代言人的華文報章，自然傾向從受害者的角度撰稿，為華人抱不平。

(二) 日治下的新加坡

前述審判戰犯的詩作，焦點都在口述的個案，是以新聞報導的手法、夾以作者的主觀情感來呈現。而有關淪陷時期新加坡社會及經濟狀況的詩作，則是以軼事、筆記或專題紀述的形式展示，保留了「竹枝詞」的世俗氣息。雖時帶嘲諷的成分，但反映的卻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圖景。首先，日軍進佔新加坡之初，即強逼華僑領袖林文慶 (1869-1957) 等成立華僑協會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以便日軍監控華人社會，推動有利於日軍統治的活動，如籌款賑濟日本傷兵、開辦日本語研習班等。⁹¹ 又極力搜刮華人資產，要全馬華僑繳納五千萬元「奉納金」(volunteer donation)，若逾期仍未籌足款數，即招致殺身之禍。募款期間，林文慶等人尚不斷遭到日人的侮辱和折磨。⁹² 《血海》第五十九首，借用了日人的口吻描述奉納金一事：

五千萬元奉納金，浩蕩皇恩似海深。若要華僑生命保，切須革面洗身心。(頁 63)

根據注文，詩中第三、四句乃是山下奉文對華僑領袖的訓話。⁹³ 謝松山在用反諷語譏刺日人的浩蕩「皇恩」，其實是對華人的欺壓和迫害。

日治下的新加坡，社會怪象紛呈，人性被扭曲，物資短缺，餓殍遍地。日人復實施一系列奴化政策，壓制異族文化，在經濟上則大肆榨取民脂。新加坡人民生活日人的魔爪之下，只能聽天由命。《血海》對這些情況，頗多描述。先看其中一種「社會畸形的怪現象」：

⁹¹ 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華僑協會的組織〉，頁 217-218。

⁹²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536-542；Ralph Modder, "The \$50 Million 'Donation,'" in *The Singapore Chinese Massacre*, pp. 74-77;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pp. 195-196.

⁹³ 謝松山，《血海》，頁 63。

漢字旁添片假名，牌書株式更通行。東洋風味人人愛，莫說投機不競爭。
（第六十四首，頁 67）

注文提到昭南時期施行日文教育，「市內行政機關，公文來往，概用日文，於是日文日語遂成為市民一種風尚……華人商店招牌每添上片假名或平假名譯音，有限公司則改株式會社，一時東洋化風行全島矣。」⁹⁴ 所謂「東洋風味人人愛」，日本統治的信息，遂透過改用日文招牌這一現象攻陷了新加坡人民的生活空間。⁹⁵

另一畸形現象是由於謀生困難而盛行的娼妓業和賭博業。《血海》書中有四首提及昭南時期不幸墮落風塵、或自願委身予日本軍官的女性。如第六十五首云：

酒館茶樓改食堂，妖嬈女給捧壺漿。半推半就花枝展，漫說皇軍獸性狂。
（頁 68）

注文承接第六十四首，稱自東洋習俗風靡全島後，投機商人即按日人習慣，將酒館茶樓改名為食堂 (shokudou)，女招待稱為女給 (jokyuu)。有些食堂更特地徵募美貌少女，門外懸有「軍專用」或「軍利用」招牌，專門招待「皇軍」。⁹⁶ 另有貪慕虛榮的女性，以嫁作日本軍官外室為榮。第六十六首的注文即說：「吾人在道上每見插有紅旗之汽車，乘坐夜服麗都之女子，即為日軍官所暱者，居則華屋，出入以汽車代步，風馳電掣，趾高氣揚，睥睨不可一世，自日人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此輩女子獨守空房，再無昔日之氣焰矣。」這段注文鑄裁為七絕則變成：

嫁得夫婿是紅旗，汽車金屋日追隨。忽然兵敗冰山倒，獨守空房暗自悲。
（頁 69）

⁹⁴ 謝松山，《血海》，頁 67-68。有關日治時期新加坡的教育情況，參閱許雲樵，〈淪陷時期的新加坡教育〉，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頁 454-457；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頁 221-223。

⁹⁵ 商店改為「會社」並附上片假名，以及交通標誌、街道名稱等改用日文等現象，另見〈淪落時期的人民生活〉，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頁 419；Brenda S. A. Yeoh (楊淑愛) and Kamalini Ramdas, "Remembering Darkness: Spectacle, Surveillance and the Spaces of Everyday Life in Syonan-to," in P. Lim Pui Huen and Diana Wong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p. 162.

⁹⁶ 謝松山，《血海》，頁 68。

第六十七首則提到某富家女，與一日本官員公然同居，甚至誕下混血兒。光復後日人被遣回國，此富家女「遂作半生未亡人矣」。⁹⁷ 這些情況在史籍中固有所記載，⁹⁸ 而謝松山提到的這類個案，有些是他耳聞目睹，有些或出於個人揣測，雖不能純然視之為史料，卻也起了「補史」的作用。

賭博業和娛樂業的興盛，亦有不少史籍提及。據稱日軍此舉，是為了麻醉當地人民，消解反抗情緒。當時最受矚目的遊樂場所是位於惹蘭勿剎的「新世界」，裏面有供少女歌舞團演出的「共榮閣」，電影、遊戲設備式式俱備，光是食堂和咖啡座即有一〇六所，連同其他商店，共計三百餘家。⁹⁹ 關瑞發在其〈日治時期新加坡表演藝術探討〉一文中指出，日軍進佔新加坡後不久，為了展示在其統治下，昭南島治安良好、歌舞昇平的一面，即對娛樂界「鬆綁」，允許電影院和劇場恢復經營。娛樂事業遂「如脫韁之馬，快速發展起來」。居民在苦悶之餘，亦藉各種娛樂麻醉自我。¹⁰⁰ 謝松山在《血海》第七十四首的注文中亦說，日軍在 1942 年冬恢復各遊藝場，「目的在鼓勵賭博，麻醉人心。此種慣技在中國各淪陷區行之已久，蓋日人深知中國人性好賭博也。……遊藝場中祇見賭攤林立，賭具紛陳，五光十色，無奇不有，而遊人如鯽，趨之若鶩，千金一擲無虛夕，沈溺其中者正不知地球上每一角落尚在炮火連天，烽烟遍地，可謂別開生面之繁榮。」詩曰：

遊藝場中新設施，繁榮「世界」信稀奇。千金一擲無虛夕，試問是誰幸運兒。（頁 76）

「世界」是新加坡人對遊藝場的稱呼。¹⁰¹ 除了設在遊藝場、領有經營執照的賭場外，島上還有許多非法賭館。不少人因沉迷賭博而傾家蕩產，有些要抵押、變賣資

⁹⁷ 詩云：「雙宿雙棲喚親親，中日聯婚花樣新。孽種遺留何所托，半生長作未亡人。」同前引，頁 70。洪錦棠亦提到有些女性自願委身於日人，見洪錦棠，〈日寇與各民族〉，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頁 462。

⁹⁸ Sylvia Mei Lian Foo,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1942-45: Socio-Economic Policies and Effects," BA Honours Thesis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7), pp. 18-19, 67-68. 文中稱墮落風塵的女子，都是為生計所逼，戰後有大批年齡屆乎十至十四歲的少女因患上性病而需尋求治療。

⁹⁹ 〈淪陷時期的人民生活〉，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頁 421。

¹⁰⁰ 關瑞發，〈日治時期新加坡表演藝術探討〉，收入李選樓主編，《新華文學 50 年論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15），頁 266。

¹⁰¹ 謝松山，《血海》，頁 76。

產，走投無路者甚或自戕。有研究指出，除了新加坡，馬來亞各地亦是賭館成林，日人稱這是在困難的日子裏的一種「精神安慰法」，而「頗有容忍力」的日本官員因此容許這種「罪惡制度」的存在。那些因賭博而破產者，更容易受到日人的控制，由賭博業賺取的厚利，最終亦有不少透過稅收流入日軍政府。¹⁰² 這些是謝松山的詩中沒有反映出來的情況，而需要其他史料為其作補注的。可見《血海》的「詩史」創作，只是一幅幅帶有作者主觀情感在內的時代剪影，而非客觀地摹寫、涵概史實的全景圖。

日軍壓榨新加坡人民的伎倆，還體現於一些具有欺壓性的經濟措施。姑舉幾首作品為例說明。其一是所謂的「組合」(kumiai)：

生財有道道無涯，花樣翻新盡適時。壟斷物資稱組合，官商合辦美名詞。(第八十首，頁 81)

從詩本身來看，「組合」乃一旨在增加財富的措施，然而背後動機卻是要壟斷物資。據注文稱，此舉是日人為補充軍事物資供應而採取的策略，上至糧食，下至日用品，皆有「組合」，非經組合則不能發售，即使是商人自行輸入的貨品亦須登記作組合。¹⁰³ 而物品一經「組合」，「好的必讓日本人先揀去，剩下的才賣給民眾」，甚至無物可售，總之是日軍的需要凌駕於民眾之上。¹⁰⁴ 曰「生財有道」，曰「花樣翻新」，謝松山的詩諷刺味極濃，不過卻不能將「組合」的禍害盡數披露於七絕中，此時注文的解釋便顯得很有必要了。這再次證明，「詩」不能完全代替「史」，但「史」的描述亦缺乏「詩」的精警和機趣。

「組合」之外，又有所謂「浪機關」(Nami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血海》第八十五首記云：

浪人偏有浪機關，物物交流滿載還。誰識其中真奧妙，幾人見利不追攀。(頁 85)

¹⁰² Sylvia Mei Lian Foo,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1942-45," pp. 65-67.

¹⁰³ 謝松山，《血海》，頁 81。

¹⁰⁴ 〈淪陷時期的人民生活〉，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頁 423-424；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p. 199; Sylvia Mei Lian Foo,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1942-45," pp. 52-53.

這又是一種日人搜括財物的勾當，亦有人為了利益，不惜借此攀附日人。但詩句雖語帶譏諷，卻始終語焉不詳，這時又需要注文和史料幫助解釋。謝松山的注文稱，「浪機關」是由日軍主持，凡擁有船舶之商人皆可申請往暹羅或其他地區運載米糧到新加坡，以解決糧食問題。商人申請後即獲「浪機關」授予特別旗幟，海關不得過問，惟運來之米糧，須交一半與日軍政府或部隊。日軍後來又以現款或貨物貸與商人作為採購或交換之用，商人既不需資本，且運來之米糧，利市百倍，因此都樂於趨附。但卻不知「浪機關」乃一間諜組織，利用商民以獲取各地情報云云。¹⁰⁵不過此機關具體如何進行間諜活動，注文仍無清楚的交代。據其他資料載，日人實透過商人到各地採購物資，刺探和搜集聯軍的情報，而機關內的中層活躍分子，不少是願為日人效命的臺灣人。¹⁰⁶可想而知，日人所謂的經濟措施，處處都是以榨取民膏為前提，以致淪陷時期的新加坡，民不聊生，饑餓成為一種常態，且看以下詩作：

增加生產日呼號，物價飛騰節節高。種得食糧軍要用，終年胼胝枉徒勞。（第八十一首，頁81）

米珠薪桂竟如斯，斗米千元何足奇。一日兩餐何處辦，木茨無奈且療飢。（第八十三首，頁83）

飢餓難捱祇雜糧，木茨無奈太多嘗。人人缺乏維他命，腳腫如椽又潰瘍。（第八十九首，頁88）

這些作品，不啻是一幅幅饑民圖，讀者一看即可明白。而謝松山的注文則往往交代一些詩歌以外的補白，如日軍督令民眾將原有的樹膠園和椰園改植米穀及雜糧，而多吃木茨則會染上腳氣症，加以缺乏藥物治療，很容易導至腳部潰瘍。

短篇的紀事詩，往往以聯章體吟詠一事，蓋有時一詩不足以概括該事之本末，或作者意猶未盡，遂復添至二首、三首以上。前面描寫饑餓、東洋化的詩篇即不止一首。以下幾首，則是關於日軍如何勞役新加坡民眾，當中提到了「勤勞奉仕隊」(Kinro Hoshitai) 和強拉壯丁的「轉業」(jobuzu) 條例：

¹⁰⁵ 謝松山，《血海》，頁85。此詩較原〈昭南竹枝詞〉的版本改易甚大，除第一句相同外，原第二至四句云：「如蟻附羶人一般。黑市公然任交易，萬千貨幣積如山。」見劫後餘生，〈昭南竹枝詞〉，《南洋商報》，1946年6月19日，第4張。

¹⁰⁶ 〈昭南時代組織之秘密浪機關〉，《南洋商報》，1947年7月12日，第12張。同文另見〈浪機關組織之秘密〉，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頁480-482。

勤勞奉仕隊名新，此是天皇大國民。差幸孔方能作祟，金蟬脫殼已經旬。（第九十首，頁 88）

轉業規條一實行，家家戶戶哭餘生。生男反悔不生女，十六男兒須遠征。（第九十一首，頁 89）

居然號召入皇軍，兵補強徵日夜間。抽盡壯丁餘女性，滿城風雨鬧紛紛。（第九十二首，頁 90）

「勤勞奉仕隊」的工作，是到指定地點挖戰壕，或築防空避難室等。「差幸孔方」兩句，指富裕之華人以金錢僱人替代，或賄賂區內隊長以求免役，但期限一至，又需想辦法應付。¹⁰⁷ 至於「生男反悔不生女」，乃是借用了杜甫〈兵車行〉中的詩句。杜甫的「詩史」創作，在此又起了啟迪的作用。

《血海》並非只記載了淪陷區悲慘、畸形的一面，像許多具有抗日意識的作品那樣，它還是帶出了一些正面的、令人鼓舞的訊息。例如日軍在太平洋戰事的失利，新加坡的光復等。還有一首是描寫抗日遊擊隊的：

馬來征服已三年，伏莽穿林遍地延。山鼠竟成心腹患，招安討伐兩徒然。（第一〇一首，頁 96）

注文謂儘管日軍軟硬兼施，仍無法剿滅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山老鼠」即日軍對遊擊隊的蔑稱，亦比喻了抗日力量前仆後繼，難以剷除。1945 年 9 月 5 日，英軍在新加坡登陸。9 月 12 日，日軍正式簽署了投降書，黑暗的昭南時期終告結束。隨即廢棄的，是日本軍票（俗稱「香蕉」票），以及日人在統治時期留下的一些地標，如建於武吉知馬高地的「忠靈塔」(Chureito)：

忠靈塔內祀孤魂，神社昭南莫我尊。山上而今碑不見，空餘遺跡伴黃昏。（第一〇七首，頁 100）

「忠靈塔」和「昭南神社」(Syonan jinja) 是日軍為紀念在新加坡戰事中陣亡的將

¹⁰⁷ 「勤勞奉仕隊」在各淪陷區都有成立，關於新加坡的情況，參見〈淪陷時期的人民生活〉，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頁 427。「轉業」見同書頁 426。

士而建。日軍投降後，即將神社和碑塔自行拆除。¹⁰⁸ 謝松山這首作品，結句借景抒情，頗有傳統詠史詩的味道。作為整部「詩史」的終曲之一，它以一天時間的尾聲——黃昏和殘餘的遺跡，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彷彿歷史最後都被塗上了一片昏淡微茫的詩意。雖然代表日治時期的地標已不復存在，然而那段慘痛的經歷和精神創痛，卻透過《血海》這類帶有控訴性的詩文，永遠銘刻在那一輩新加坡人的記憶之中。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和紀述者，謝松山自然亦希望其著作可以垂之久遠，永為後人的警鑑。

六、結語

謝松山的《血海》，相當全面地記述了日治時期新加坡的情況，從日軍登陸，至檢證大屠殺，至各種壓迫奴役新加坡民眾的措施，至日軍投降，無一不書之筆下，可以說和一部「史書」差不多。但它和史書的不同處，是以「詩」為綱，再以具有史料性質的注文補白。「詩」與「史」互為發明，並貫注了作者的主觀情感，是名副其實的「詩史」著作。前人如杜甫的作品，雖名為「詩史」，「史」的部分卻往往需要後人為其作注補充，方得明瞭創作背景與細節，故其「詩」的功能和價值遠大於「史」。而《血海》則是有意識地將「詩」、「史」並置，兩者的重要性似不相上下。沒有了注文，《血海》的許多詩作，例如大檢證審判的部分，人物和事件便顯得語焉不詳；而沒有了詩，它就只能算是一部像回憶錄般的歷史著作。謝松山顯然想讓《血海》一書同時具有抒情和紀事的功能。但文學技巧方面，《血海》的詩作卻有過於直率之處。陳平原論述中國「詩史」作品時指出，中國傳統詩學著重的是「言不盡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類含蓄的表現手法，即使是敘事詩亦不例外。¹⁰⁹ 作為熟諳中國詩歌傳統的讀者，我們已習慣了那一套詩學觀，因此《血海》裏較為直白的詩歌，相對而言便顯得乏味。然而作為一部以紀史為目的、控訴意味極強的寫實式作品，這一缺憾似亦無可厚非。

¹⁰⁸ 據稱「昭南神社」和「忠靈塔」的建造，花費了二十餘萬元，費用都是搜刮得來。見〈淪陷時期的人民生活〉，收入許雲樵、蔡史君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1937-1945）》，頁 420。

¹⁰⁹ 陳平原，〈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頁 264。同樣看法亦見於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圖書，2002），頁 140-141。

從最早的〈昭南竹枝詞〉到最後《血海》的成書，謝松山的創作過程，明顯發生了一自我拔高的演變。初時軼事式的寫作，仍帶有供「茶餘飯後之談」的述異性質。受到大檢證戰犯審判的衝擊而推出的〈昭南紀事詩〉和接續的《血海》，則更為正視日據時期血雨腥風的殘酷事實，原有的軼事式寫作亦因此被讀者提升到「詩史」的高度。作品標題的改易，引起的社會反應亦更為強烈：「竹枝詞」和「紀事詩」這些名稱，文人色彩較濃，而《血海》一名，顯然更能得到飽嚙淪陷之苦的廣大讀者的認同，從而勾起他們沉痛的集體記憶。

事過境遷，《血海》一書幾已無人問津，日佔時期的創痛已漸漸愈合，甚至被忘卻。不想回顧 (the desire to forget) 淒慘的過去，自屬人之常情，然而在一片歌舞昇平的大環境下，吾人或許要重新認識到戰爭的醜惡、和平的可貴，擔負起「記憶的責任」(the duty to remember)。前車可鑒，《血海》的創作目的和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勾起後人的記憶與反思，讓他們汲取教訓，勿讓類似的悲慘歷史重演。

(責任校對：李奇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毛詩正義》*Maoshi zhengyi*，《四部備要》*Sibu beiyao* 經部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7，阮刻本重印 Ruan keben chongyin。
- 沈 約 Shen Yue，《宋書》*Song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 黃宗羲 Huang Zongxi，《南雷文定》*Nanlei wending*，《四部備要》*Sibu beiyao* 集部第 236 冊，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35，粵雅堂叢書影印本 Yueyatang congshu yingyinben。
- 蕭 繹 Xiao Yi，《金樓子》*Jinlouzi*，《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子部第 84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二、近人論著

- 《南洋商報》*Nanyang shangbao*（新加坡 Singapore），1946-1965 多期。
- 〈鄭光漢傳略〉“Zheng Guanghan zhuanlue”，泉州文史資料全文數據庫 Quanzhou wenshi ziliao quanwen shujuku，<http://mnwhstq.cn/was40/detail?record=5011&&channelid=29719>，2016 年 3 月 16 日下載。
- 王利民 Wang Limin，〈劉子翬紀事詩考論〉“Liu Zihui jishi shi kaolun”，《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6，北京 Beijing：2014，頁 53-55。
- 方 勇 Fang Yong，〈走筆成詩聊紀實：簡論南宋遺民汪元量的詩歌特徵〉“Zoubi chengshi liao jishi: jianlun Nansong yimin Wang Yuanliang de shige tezheng”，《天中學刊》*Tianzhong xuekan*，14.4，駐馬店 Zhumadian：1999，頁 35-39。
- 方 修 Fang Hsiu，《馬華新文學簡史》*Mahua xinwenxue jianshi*，吉隆坡 Kuala Lumpur：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Malaixiya huaxiao dongshilianhehui zonghui，1986。
- 江寶釵 Jiang Bao-chai，《臺灣古典詩面面觀》*Taiwan gudianshi mianmianguan*，臺北 Taipei：巨流圖書 Juliu tushu，2002。
- 李西浪 Li Xi-lang，《劫灰集》*Jiehui ji*，香港 Hong Kong：永發印務 Yongfa yinwu，1946。

- 李恩涵 Li En-han, 《東南亞華人史》 *Dongnanya huaren shi*,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2003。
- 李慶年 Li Qing-nian, 《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 (1881-1941)》 *Malaiya huaren juitishi yanjin shi (1881-1941)*,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8。
- _____, 《南洋竹枝詞匯編：中國以外唯一竹枝詞匯編》 *Nanyang zhuzhici huibian: Zhongguo yiwai weiyi zhuzhici huibian*, 新加坡 Singapore: 今古書畫店 Jingu shuhuadian, 2012。
- 林立 Lam Lap, 〈劫灰與蘭花：新加坡日據時期的兩部舊體詩集〉“Jiehui yu lanhua: Xinjiapo riju shiqi de lianbu juitishi ji”,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 香港: Hong Kong, 2016, 頁 237-265。
- 柯木林 Kua Bak-lim 主編, 《新華歷史人物列傳》 *Xinhua lishi renwu liezhuan*, 新加坡 Singapore: 教育出版 Jiaoyu chuban, 1995。
- 姚夢桐 Yeo Mang Thong, 〈時代的印記：邱菽園《檀樹詩集》的出版及其意義〉“Shidai de yinji: Qiu Shu-yuan *Tanxie Shiji* de chuban ji qi yiyi”, 《華人文化研究》 *Huaren wenhua yanjiu*, 1, 臺北 Taipei: 2013, 頁 135-147。
- 徐復觀 Xu Fuguan, 《中國文學精神》 *Zhongguo wenxue jingshen*, 上海 Shanghai: 世紀出版集團 Shiji chuban jituan、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 2006。
- 高荊梅 Gao Jingmei, 《〈南宋雜事詩〉研究》“*Nansong zashi shi*” *yanjiu*, 西安 Xi'an: 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Shanxi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 2009。
- 高嘉謙 Ko Chia-cian, 〈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Digu, siwen, fengtu: lun zhuxin shijie Zuo Binglong, Huang Zunxian yu Mahua wenxue”, 《臺大中文學報》 *Taida zhongwen xuebao*, 32, 臺北 Taipei: 2010, 頁 359-397。doi: 10.6281/NTUCL.2010.32.10
- _____, 〈帝國、詩與孔教的流亡：論丘逢甲與康有為的南洋詩〉“Digu, shi yu Kongjiao de liuwang: lun Qiu Fengjia yu Kang Youwei de nanyang shi”, 收入吳盛青 Wu Shengqing、高嘉謙 Ko Chia-cian 主編, 《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 *Shuqing chuantong yu weixin shidai: Xinhai qianhou de wenren, wenxue, wenhua*, 上海 Shanghai: 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2012, 頁 183-215。
- 浩劫餘生（謝松山） Haojieyusheng (Xie Songshan), 〈昭南紀事詩（上卷）〉“Zhaonan jishi shi (shang juan)”, 《南洋雜誌》 *Nanyang zazhi*, 2.3, 新加坡 Singapore: 1948, 頁 49-55。
- _____, 〈昭南紀事詩（下卷）〉“Zhaonan jishi zhi (xia juan)”, 《南洋雜誌》 *Nanyang Zazhi*, 2.4, 新加坡 Singapore: 1948, 頁 74-78。

- 崔貴強 Chui Kwei-chiang, 《新加坡華文報刊與報人》*Xinjiapo huawen baokan yu baoren*, 新加坡 Singapore: 海天文化 Haitian wenhua, 1993。
- _____, 《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Xinjiapo huaren: cong kaibu dao jianguo*, 新加坡 Singapore: 教育出版 Jiaoyu chuban, 1994。
- 許雲樵 Xu Yun-qiao、蔡史君 Tsai Shi-jun 編, 《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Xinma huaren kangri shiliao (1937-1945)*, 新加坡 Singapore: 文史出版 Wenshi chuban, 1984。
- 陳平原 Chen Pingyuan,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Zhongguo xiaoshuo xushi moshi de zhuanbian*, 香港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03, 〈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Shuo ‘shishi’: jianlun Zhongguo shige de xushi gongneng”, 頁 259-279。
- 陳育崧 Tan Yeok Seong, 〈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Zuo Zixing lingshi dui Xinjiapo huaqiao de gongxian”, 收入左秉隆 Zuo Binglong, 《勤勉堂詩鈔》*Qinmiantang shichao*, 新加坡 Singapore: 南洋歷史研究會 Nanyang lishi yanjiuhui, 1959, 前頁 1-9。
- 張 暉 Zhang Hui, 《中國「詩史」傳統》*Zhongguo ‘shishi’ chuantong*,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2。
- 張錦忠 Tee Kim Tong, 〈繼續離散，還是流動：跨國、跨語與馬華（華馬）文學〉“Jixu lisan, haishi liudong: kuaguo, kuayu yu Mahua (Huama) wenxue”, 收入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 Malaixiya liutai xiaoyouhui lianhezonghui 主編, 《馬華文學與現代性》*Mahua wenxue yu xiandaixing*, 臺北 Taipei: 新銳文創 Xinrui wenchuang, 2012, 頁 139-149。
- 黃孟文 Wong Meng Voon、徐迺翔 Xu Nai-xiang 主編, 《新加坡華文文學史初稿》*Xinjiapo huawen wenxueshi chugao*,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Xinjiapo guoli daxue zhongwenxi, 2002。
- 黃錦樹 Ng Kim Chew, 〈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Guoke shiren de nanyang secai zhuilun: yi Kang Youwei deng weili”, 《海洋文化學刊》*Haiyang wenhua xuekan*, 4, 基隆 Keelung: 2008, 頁 1-24。
- _____, 〈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Jingwai zhongwen, linglei zujie, xiandaixing: lun Mahua wenxueshi zhiqian de Mahua wenxue”, 收入吳盛青 Wu Shengqing、高嘉謙 Ko Chia-cian 主編, 《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Shuqing chuantong yu weixin shidai: Xinhai qianhou de wenren, wenxue, wenhua*, 上海 Shanghai: 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2012, 頁 152-182。

- 馮仲漢 Foong Choon Hon 主編，《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匯編》*Juansiwei: dazhan qianhou Xinma shiliao huibian*，新加坡 Singapore：亞太圖書 Yatai tushu、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Xinjiapo zhonghua zongshanghui，1999。
- 葉鍾玲 Yeap Chong Leng，〈左秉隆與會吟社〉“Zuo Binglong yu huiyinshe”，《中教學報》*Zhongjiao xuebao*，27，新加坡 Singapore：2001，頁 115-128。
- 新馬僑友會 Xinma qiaoyouhui 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Malaiya renmin kangri douzheng shiliao xuanji*，香港 Hong Kong：香港見證出版 Xianggang jianzheng chuban，1992。
- 蔡英俊 Tsai Ying-chun，〈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Shige yu lishi: lun shishi de lishi chengfen ji qi xushu de zhuanxiang”，《清華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3，新竹 Hsinchu：2009，頁 239-272。
- 鄭光漢 Zheng Guang-han 編，《蘭花集》*Lanhua ji*，新加坡 Singapore：鄭光漢 Zheng Guang-han，1966。
- 鄭毓瑜 Cheng Yu-yu，〈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典故運用為例〉“Jiu shiyu de dili chidu: yi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zhong de diangu yunyong weili*”，收入吳盛青 Wu Shengqing、高嘉謙 Ko Chia-cian 主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Shuqing chuantong yu weixin shidai: Xinhai qianhou de wenren, wenxue, wenhua*，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2012，頁 482-519。
- 劉成禺 Liu Chengyu、張伯駒 Zhang Boju，《洪憲紀事詩三種》*Hongxian jishi shi sanzo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3。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宋詩選注》*Songshi xuanzhu*，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2。
- ____，〈談藝錄（補訂本）〉*Tanyi lu (buding 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謝松山 Xie Songshan，《血海》*Xue hai*，新加坡 Singapore：南洋報社 Nanyang baoshe，1950，10 月第三版。
- 關瑞發 Kwan Swee Huat，〈日治時期新加坡表演藝術探討〉“Rizhi shiqi Xinjiapo biaoyan yishu tantao”，收入李選樓 Li Xuan-lou 主編，《新華文學 50 年論文集》*Xinhua wenxue 50 nian lunwen ji*，新加坡 Singapore：新加坡文藝協會 Xinjiapo wenyi xiehui，2015，頁 265-274。
- 龔鵬程 Gong Peng-cheng，《詩史本色與妙悟》*Shishi bense yu miaowu*，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93。
-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March to April, 1947.

- Butler, Thomas. "Memory: A Mixed Blessing," in Thomas Butler (ed.), *Memory: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Mi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p. 1-31.
- Casey, Edward S.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ber, Dena Elisabeth and Arthur G. Neal.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earch for Identity," in Dena Elisabeth Eber and Arthur G. Neal (eds.),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ed Truths and Competing Realities*.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2001, pp. 169-182.
- Foo, Sylvia Mei Lian.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1942-45: Socio-Economic Policies and Effects," BA Honours Thesis,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7.
- Misztal, Barbara A.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Maidenhead,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odder, Ralph. *The Singapore Chinese Massacre: 18 February to 4 March 1942*.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4.
- Turnbull, C. 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Wong Yoon Wah (王潤華). *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2. doi: 10.1142/9789814350945_fmatter
- Yeo Song Nian (楊松年) and Ng Siew Ai (黃秀愛).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s Reflected in Singapore-Malaya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5-49)," in P. Lim Pui Huen and Diana Wong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106-119.
- Yeoh, Brenda S. A. (楊淑愛) and Kamalini Ramdas. "Remembering Darkness: Spectacle, Surveillance and the Spaces of Everyday Life in Syonan-to," in P. Lim Pui Huen and Diana Wong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160-185.

Sea of Blood: A Classical-Style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 abou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ingapore

Lam Lap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sl1@nus.edu.sg

ABSTRACT

In the horrible Sook Ching Massacre, at least twenty-five thousand Singaporean Chinese were slaughtered. Afterward, the Japanese army administration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highhanded measures to extort wealth and resources from the Chinese, who,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lived in extreme poverty, fear and hunger in this darkest age of Singapore history. *Sea of Blood* is a collection of classical-style Chinese poetry with detailed narrative notes that remembers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and the va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vices in the Syonan years. From 1946 to 1950, the author Xie Songshan 謝松山 published the book in three different forms and also changed the title significantly. In this article, I attempt to explicate the meaning behind the title change and the traumatic collective memori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evoked by this collection an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memories, and poetry writing by comparing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especially those in newspapers.

Key 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Sook Ching Massacre, traumatic memories, tradition of poetic-history, *Sea of Blood*, Xie Songshan 謝松山

(收稿日期：2015. 10. 23；修正稿日期：2016. 2. 18；通過刊登日期：2016. 6. 7)

